永在追念中的韜奮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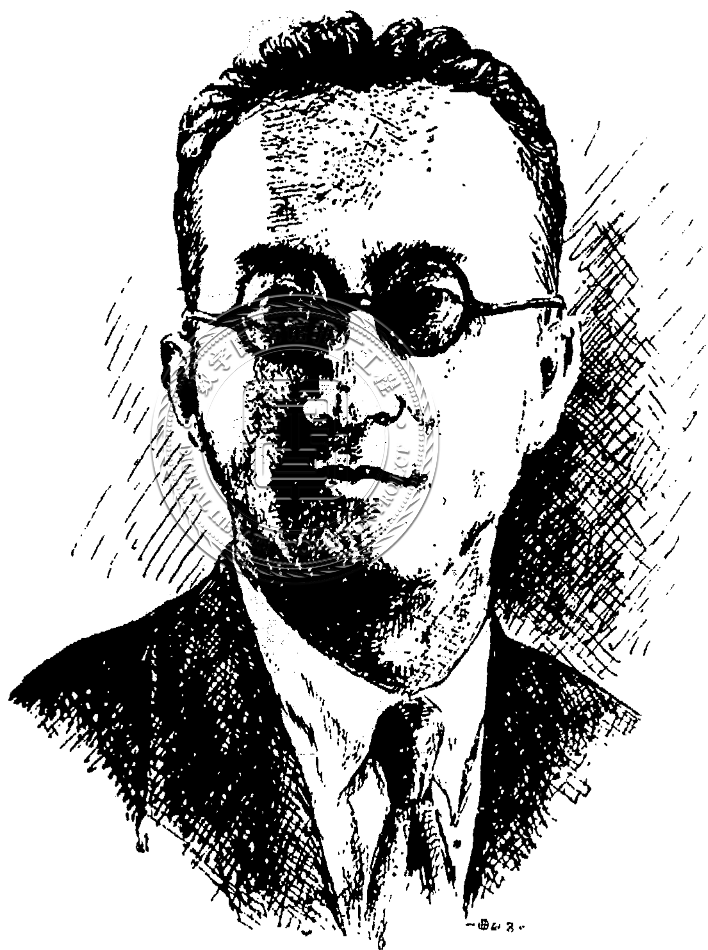
永在追念中的韜奮先生

韜奮出版社 編









韜奮先生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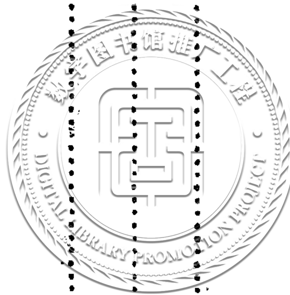


韜奮夫人及女公子在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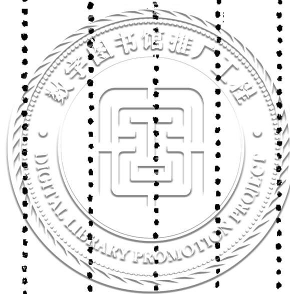
韜奮先生之墓

目次



＊

II



鄒韜奮先生事略

先生是以筆名聞於世的，原名恩潤，有一個時候名遜庵，韜奮是在十五年主編生活週刊以後所用的筆名，學生時代最早向申報自由談投稿，筆名叫谷僧。原籍江西南昌，但先生自己在有關文件上多填江蘇上海，因自小即生活在上海。

先生是養育在大家族裏面的，父親字庸倩。同輩總排行第十四。先生出生之年，大概是辛亥前十七年九月某日。母親浙江海寧查氏，生三男三女，先生居長。不幸母親早逝，其時先生只十三歲。父親做官很清正，家裏一貧如洗，在福州候補時，要領施米貼補一家的生活，其後退休，更是一無儲蓄。所以先生少年就學時代即全靠自己設法，半工半讀，還要照顧兩個弟弟，是非常艱苦的。他在所著「經歷」裏，有很詳細的敍述。父親至今健在，年逾七十，寓居北平，家裏還有許多人；先生在上海時，迄至抗戰起來，最近在重慶這幾年，一直按月不斷匯款接濟家用。

第一個夫人葉女士，婚後不到兩年，以傷寒症去世。現在的夫人沈粹縝女士是在接辦生活週刊這

個時期結婚的，隨時隨事，協助先生，平時家庭融和快樂，故先生得一心專注於著作。先生一生對經濟、社會、政治，堅苦奮鬥，幾乎恆久是在憂患中過生活，他所引以為自娛的是什麼呢？他說『在那樣靜寂的夜裏，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們；……我們的精神是和無數萬的讀者聯繫着，又好像我們是夾在無數萬的友叢中工作着』。這眞寫出了他在埋頭寫作中，精神和意境之廣闊、偉大、飛揚、深靜，現在讀起來，似尚有萬丈光輝，射入一切寫作者的腦裏，得到心心相印的安慰，這樣，就鼓舞了他一生的努力工作。除此之外，恐怕還要算是他的家庭確給予了他以充分的安適和歡樂。此次病中及疾革時候，沈女士都在身旁。生子二，嘉驊、嘉騮，女一，嘉驪。

以上所說，是先生家庭的大概。

先生的學歷第一個階段，是經過南洋公學的附屬小學、中學、大學電機科二年級。當在中學一年級第二學期，家中經費供給已告斷絕，幸得『優行生』資格，得以免除學費，但是其他的一切費用仍是不夠。父親原來希望他做工程師，經過先生自已種種考慮，改變了計劃，可說是在這時起，便下決心想做新聞記者。於是，改進聖約翰大學的文科。因為經濟關係，在其先，並同時，兼做家庭教師。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後來出國，又曾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和大學院研究。

聖約翰畢業後，依先生志願，就要進新聞界，但是事實那裏有這樣便當呢！因生活關係，便還就助擔任了上海紗布交易所裏的英文祕書。不久，又兼就申報館助理答覆英文信件，青年會中學英文教員等事。其後，中華職業教育社請先生擔任編輯部主任，編譯職業教育叢書和月刊，同時兼任職業學校的英文教務主任並兼教授，約七八年之久。民國十五年冬間，參加生活週刊工作，十六年辭去職教社編輯股職務，以整日的時間，擔任時事新報館祕書主任，晚上，還是替職教社編譯，這樣工作，約有一年光景。因生活週刊進展的迅速，使先生不能不擺脫一切，開始了和他一生前途有關係的新生活。

生活週刊在先生接辦之初，每期出版只二千八百份左右，因先生負責改編，而壁壘爲之一新。據先生自己說：『我接辦之後，變換內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對於編製方式的新穎和相片插圖的動目也很注意。』『每期的小言論雖僅僅數百字，卻是我每週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我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爲最該說幾句話的事情發表我的意見、其次，是信箱裏解答的文字。』『我對於搜集材料，選擇文稿，撰述評論，解答問題，都感到極深刻濃厚的興趣。我的全副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爲一體了。』又說『也許是由於我的個性的傾向和一般讀者的要求，生活週刊漸漸轉變爲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對於黑暗勢力不免要迎頭痛擊』。『生活週刊既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

發生着密切的關聯，社會的改創到了現階段，又決不能從個人主義做出發點，如和整個社會的改造脫離關係，而斤斤較量個人的問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於是，生活週刊應着時代的要求，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看了上面先生自己所說的幾段話，可以瞭然於當時整個生活週刊的作風和它的內容的大概。

生活週刊一天天發達，銷路擴至十五萬份以上，既為海內外數十百萬讀者所擁護，中華職教社『深知道這個週刊在社會上確有它的效用，允許它獨立』，由是，生活週刊脫離職教社，另組合作社，產生了生活書店。後來，它的業務發展到全國分支店達四十二所，前後出版書籍一千零五十餘種，不能不說是完全由於先生心血和精誠所傾注培養而成功的。至關於它的組織，完全是合作性質，『苦幹十餘年，大家還是靠薪水養家糊口』，這種辦法，亦是由於先生意思所規劃而決定的。

生活週刊既『時時立在時代的前線』，不幸而時代的嚴重日益加甚，『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降臨，全國震動，先生亦不得不由言論而漸入於行動。當馬占山喋血抗戰，消息轉到上海，生活週刊社代收讀者捐助前方之款，數量達十二萬元，創開了在抗戰中以刊物而代收民眾捐款之門。乃忌者紛起，謠諑繁興，又因參加『民權保障同盟』的緣故，遂迫使先生不得不出國而作歐洲之游，環歷地球一週，於察年九月返國。返國後，主辦大眾生活，對於團結抗戰和民主自由，提出最明顯的主張，向

政府與國人作誠懇迫切的呼籲，大聲疾呼，不遺餘力，『反映了全國救亡的高潮』。隨後，曾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二十五年，又回上海主辦生活星期刊，參加文化界救國運動，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代表大會中當選執行委員，當時四人署名提出之小册子『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即為先生所屬草。是年，冬間，與其他諸友同時被捕，由上海押解蘇州，經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以危害民國罪起訴。嗣因『七七』事變，政府決策抗戰，獲予諒解，於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恢復了拘留二百四十三天後的自由。『經歷』，『萍蹤憶語』，『展望』，『讀書偶譯』就是在這個時候所寫成的。其後，敵人侵陷南京，先生挈家隨政府播遷武漢。政府聘任先生做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從武漢到重慶，從第一屆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到第五次大會，先生前後共提九案，而其中三案，都是為了力爭言論自由的：第一次請具體規定檢查書報標準並統一執行；第二次請撤銷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第三次請改善審查搜查書報辦法。請撤銷原稿審查辦法案，是提出於第一屆參政會第三次大會，當時，先生在會場裏，慷慨陳辭，不亢不卑，而又曲折盡理，能使聽者心折。因是，付表決的時候，連素來反對先生的，也有人不自覺地舉起手來，遂得以大多數通過此案，誠為從來會場所未有，這足證先生的自信力和說服他人的力量之堅強。

民國三十年春間，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將開第一次大會，先生是由政府聘請連任的，已經報到，忽

於二月二十二、三等日，疊連接到昆明、成都、桂林、曲江、貴陽等處電告，所有當時僅存的幾處生活書店的分支店，也都遭受當地政府不約而同的封閉，經理、店員，非被拘即逃散！先生對此無理壓迫，感到非常痛心，尤以自己艱難締造的文化事業，橫遭摧殘到如此田地，而不能自保，更何能保障他人？遂決意辭去參政員之職，離渝赴港。在港仍爲民主抗戰，奮鬥不懈。不幸，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陷落，又避入內地，轉輾遷徙。一年前，患中耳炎症，痛苦異常，經醫生檢視，認爲是癌，至今年七月二十四日竟以此捨棄世界而去，年僅五十，誠可深悼！這在我中華民族，無論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是一個重大損失！

先生長於理解而又富於情感，平時言動性格，確自有其與他人迥異的特點，請即引先生自己的話來作證明罷。第一是認眞，他說：『我自己做事沒有別的什麼特長，凡是擔任了一件事，我總是要認眞，要負責，否則寧願不幹』；『可是我生性不做事則已，旣做事就要盡力做得像樣。』辦生活週刊時，他說：『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舖搬到辦公室裏面去』；『我的工作當然偏重於編輯和著述方面，我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爲我所不懂的，或爲我所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校樣本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時候一樣，因爲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在香港辦生活日報時，他說：『坐鎮到版子鑄好上機，然後放心走出印刷所的門口，東

方已放射出魚肚白了，我在筋疲力盡中，好像和什麼人吵了一夜的架。』這幾段真描寫出了他對於工作方面實踐的精神。第二是性急，他在解釋他爲什麼後來不幹教員生活時說：『一因我的性太急，很容易生氣，易於疾言厲色，事後往往懊悔，對於我自己的健康也有損害，我覺得我的忍耐性太缺乏』；他敍述在時事新報做事所得的觀感中間，他稱他自己『我是個性急朋友』；他又在『韜奮自述』裏面，說他自己『特徵近視，特性性急，牛性發時容易得罪人』。誠然，依先生所說，性急也許是他的缺點，但也就正是他的優點吧。第三是求知（虛懷），他說：『十幾年來，在輿論界困知勉行的我，時刻感念的是許多指導我的師友』；又說：『我個人是在且做且學，且學且做，做到這裏，學到這裏；除在前進書報上求鎖鑰外，無時不皇皇然請益於師友，商討於同志』。就因爲能如此求知的緣故，所以他所辦的刊物能一期期的轉變前進，他的精神和思想，能一天天發皇和深入。第四是硬，他在少年求學時代，因爲費用不夠，同時又要擔任家庭教師，常自稱『硬漢教師』，並自己加以分析，說：『只是好像生成了一副這樣的性格，遇着當前的實際環境，覺得就應該這樣做，否則便感覺精神痛苦不堪忍受』；『覺得我並不是隱硬，不是要爭什麼意氣，只是要爭我在職務上本分所應有的主權，不能容許任何方面作無理的干涉或破壞』；後來畢業做事，也說：『我對於自己的職務，不肯一絲一毫的撒爛汚，但同時却不願忍受任何不合理的侮辱』；到了他辦生活週刊時，他說：『我只知道

週刊的內容應該怎樣有精采，不知道什麼叫做情面，不知道什麼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我們只要自己腳跟立得穩，毀謗誣蔑是不足畏的』。第五是光明磊落，他講到他在政治上的態度時，說：『我向來並未加入任何黨派，我現在還是如此』；又說：『我服務於言論界者十幾年，當然有我的立場和主張』。我相信，先生的話當然不是信口而說的，絕對可以他的一生言論和行動來作最好的證明。

總之，韜奮先生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也不是一個有任何黨派關係的人，並且也不能把他看做只是一個新聞記者。他是一直並永遠立在中國人民大衆的立場，面對着現實，有知識便求，有阻礙便解決，有黑暗便揭發，祇問人民大衆的需要和公意，不知自己一身的利害。就因爲這樣，犧牲一切，揮灑他的熱血，傾注他的精誠，努力創辦和支持他的二十年文化事業，就因爲這樣，決心參加了救國行動，努力於民主運動，就因爲這樣，離開了他所幾年安居的陪都，就因爲這樣，卒至不恤奔馳顚沛以迄於死。

——沈鈞儒

他的出身和苦學時代

我們老家在江西餘江縣東鄉一個叫做『沙塘村』的小村子。據說祖籍是山東，流亡到江西的年代並不久。我們的祖父，由於苦讀，中了『功名』做了官，他因為自己是窮苦出身，極力清廉自持，只以『書香傳家』四個字作為他的心願；並且受了初期的民主主義思想的感染，在滿清中葉後期『文字獄』風氣還存在的時候，他的一篇文章中却寫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的大膽的話語。我們的父親繼承了祖父的志願，在五四以後，又接受了『實業救國』的思想（這是韜奮後來曾經一度入南洋公學修電機工程系的原因），雖然身上窮得一文不名，但還非常熱心的集資籌辦紗廠，結果不但工廠沒開成，還欠了一身巨債，弄得一生潦倒，一事無成。

韜奮就是在我們家庭這種傳統思想的影響教育下長大起來的。這種傳統思想中包括着許多好的東西，如艱苦鬥爭的精神，獨立奮鬥的作風，愛護羣衆的觀點，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風氣，重視文化教育、科學教育，重視『實幹』。韜奮具備着初期的民主主義思想，再加上他自己親身經歷了近三十年來中國每一次的革命運動，就更加充實和發展了這種傳統思想的內容。

由於家庭具有『書香傳家』這種思想，所以我們弟兄小的時候都在家裏念中文（那時候我們叫『漢文』），都不入小學，一直到十七、八歲才直接進中學；韜奮更晚，大概到二十歲上下才進中學。記得一開頭他就跳了兩班，所以外國語和自然科學的學習成了他那時候嚴重的負擔。正巧那時候又碰到我們父親『丁憂』（祖父死了），不能做事，一定要在家裏閒住，家裏窮得一塌糊塗。韜奮只好在學校裏爭取頭三名成績，好獲得免費生資格。他進的是南洋公學（今天的交通大學）的中學部，這個學校程度相當高，『免費生』資格是很不容易取得的。他就日夜苦讀，往往搞到深夜才睡，有兩次竟然熬到咯血，由『學監』出來勸告，並來信給家庭通知，要家長去信勸告（那時候我們的家在福州）。因爲這樣『苦讀』，他在整個中學時期完全獲得免費生資格。中學畢業了以後，起初進本校電機工程系，因爲自然科學基礎究竟不强，所以只好轉學聖約翰大學念文科，他主修課是西洋文學，副修教育。這個學校是『闊公子』上的學校，不但費用很高，並且生活華貴，全校幾乎只有韜奮一個人是『窮小子』。我們家裏當然供給不起，韜奮只好一方面兼賣稿，兼當家庭教師，還曾一度休學當了一年多教員來維持學用和生活。由於賣稿，他和當時東方雜誌編輯胡愈之先生相識，以後兩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和黃炎培先生以及當時文化界名流相結識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他還向當時各大雜誌、各大報紙賣稿，如學生雜誌、時事新報等都有過他的文章。由於這些關係，他以後參加中華職業教育

社並主編生活週刊，曾經一度在時事新報當編輯及在滬江大學當講師等。在這裏，也可以看出他求學時代之苦了。

——鄒恩洵

雜憶

沈鈞儒

擬寫散文或較長詩篇以紀念我韜奮，苦吟三日，數毀尚未就，僅得雜憶百數十字，哀何如之！

三十六年七月十日鈞儒謹記。

韜奮與我最後分手爲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黎明之時，其地爲重慶冉子岏坦上觀音岩高坡拐角處。前一晚，將訪任老，先過良莊，以所具向國民參政會辭職書交我。平時遇有新出版書籍及刊物，見必舉以相告，輒加以說明，謂某書不可不讀，或某篇文字不可不一看。云云。

武漢淪陷前一月，曾偕赴湘贛等處前綫勞軍，歸不久，即同至重慶。

豈祇三週已六年　棗坡霧障尙漫天　夜窗痛論當時事　此景分明在眼前

交同兄弟有逾之　誼兼師友復奚疑　相知數載遭天奪　到此如何能不悲

第一相關是讀書　商量選擇到熊魚　求知今日應尤急　叉手旁皇孰啓予、

前綫勞軍緇滿衣　湘雲贛雨帶將歸　傷心最後同行日　一葉飛渝水上機

一篇脫手不脛走　海內無人敢望君　千萬自由親播種　何年箍桿組成軍

悼韜奮詩

柳亞子

長對嘉陵悼逝川　哭君忍淚已三年　遺雛差喜摩雙翅　繼志端應慰九泉

奮臂早看民衆起　游魂不信獨裁延　墓門無恙松樹在　會見光明照海邊

韜奮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賦此追悼。病腕才盡，苦未能工也。三十六年七月吳江柳亞子敬撰。

鞱奮死三年了

黃炎培

我悲君死何太急　死時國恥不曾雪　君死早　倒也好

君若生今時　不死於病　必死於淫威　淫威淫威何可以久長

千年史實　多麼彰彰　怎樣上場　怎樣下場

君其安眠　恩仇兩忘

偉大的愛國者韜奮

胡愈之

一九三一年，從歐洲回到國內的時候，我是一個悲觀論者。

當其時，白色恐怖達到最高點。無數的青年們被逮捕，被屠殺。優秀的青年作家遭活埋。進步的書報被查禁。連家中藏一本『馬氏文通』都有罪。

許多『革命同志』，當我出國之前，都是熱血青年，現在却一躍而成爲新貴人，擺出一副奴隸總管的樣相。我親見一個人道主義者做淸黨的劊子手。自命爲無政府主義者却替獨裁暴政歌功頌德。五四的英雄提倡讀經。新時代的知識份子和軍閥時代的幫閑文人，並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就是更加陰險狡猾的多。

我對我自己所代表的階層失望了。知識份子不是給權貴幫閑，就只配充奴隸總管。他永遠是背叛人民大衆的，是靠了出賣人民大衆以肥己的。

在當時在上海出版的一個小刊物上，我曾寫過一篇知識易主論。我憤恨。我咒咀我自己的階

層。我覺得要使知識份子愛國家民族，比駱駝穿針孔還難。

但是到了九一八事變以後，我的悲觀論開始搖動。而我對於知識份子的觀點的改變，則是在我認識了韜奮以後。

當我最初和韜奮認識的時候，我對韜奮的理解十分不够。我只覺得韜奮是一個平常的知識青年。他是天眞而有熱情的，但是他對一般問題的瞭解不够深刻，就是當年他所主編的生活週刊的內容也還是常帶些低級趣味。雖然當時韜奮已在呼號着抗日救國，收回失地，我以爲這是一時的感情衝動，日後他會動搖，會改變他的態度。老實說，當時我對人就沒有信心。許多口頭說的十分漂亮的知識份子，到頭來無惡不作，我不是已見到的太多了嗎？

但是，我和韜奮相識漸久，我對他的觀感便漸漸不同了。我發現韜奮和當時一般知識份子，有許多不同點：第一，他有一副硬骨頭，他的儀表是溫柔而文弱的，內心却堅强無比。待人接物，彬彬有禮；而立身處世却不容有半點苟且。讀過他的『經歷』與『抗戰以來』的，就可知道『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韜奮是確實做到了。第二，他有眞正的熱情。他不像一般知識份子，愛做領袖，愛出風頭，他有的是對國家對民族對人類的眞正熱情。是這種熱情驅使他，他才犧牲了生活享受，獻身於最艱苦的文化事業，而至於『樂此不疲』。第三，從善如流。他沒有一般知識份子自命

不凡，目空一切的壞脾氣。他從不感到自己滿足，不斷地虛心學習。就我和他認識的十餘年中，他在學習與工作上的進步是驚人的。第四，嫉惡如仇，他永不和惡勢力妥協，他用一切機會，來揭發暴露社會的黑暗面。他不愧為一個眞正的戰士。

我不否認韜奮也有一般知識份子所不可避免的缺點，例如優柔寡斷和傷感主義，韜奮也是有的。但這是小節。在大體上，一般所謂文化人，有些像『軟體動物』。軟弱而容易動搖，自私自利，自以為是。我所見的韜奮却和這些人並無相同之處。

誠如茅盾先生所說，韜奮是永遠年青的。我和韜奮同年齡，但在韜奮前面，我慚愧他比我年青得多。在不論怎樣困難的時期，他總是保持着年青人的一種生龍活虎般的朝氣。文如其人。他的文章特別為青年人所愛讀，也就是這緣故。

當初我不大明白，後來我懂得了。彷彿有一詩人說過，現實是土壤，生命是花木，而愛是肥料。有了愛的滋潤，生命是永遠年青的。許多二三十歲的人，沒有愛，只替個人打算的，那在精神上已經成為垂死的老人，韜奮是有熱愛的，所以不老。

什麼是韜奮的愛？那是對國家的愛，對人民的愛，對人類的愛，對眞理的愛。是這種偉大的愛造成了韜奮的堅强的人格。也是這種偉大的愛，產生了他的强大吸引力的文章。

韜奮不是一個大思想家，也不能算是一個不朽的作家。就文藝方面，學術方面，韜奮的成就是有限度的。但是誰都得承認，他的言論的影響非常廣大普遍。他所創辦的生活週刊與大衆生活，銷售到十五萬至二十萬，使國民黨特務當時都不能相信。在國內國外，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韜奮的愛讀者。

這是爲什麼呢？由於韜奮是一個眞正的愛國者，偉大的愛國者。

一個眞正的愛國者，不一定需要有伶俐的口才，也不一定需要有高度的寫作技術，只要他有坦白眞誠的熱情，他的主張就引起廣大羣衆的共鳴，他的言論就成爲人民大衆的喉舌。但丁、米爾頓、屈原、杜甫、雨果、羅曼羅蘭是愛國者，不是由於他們的偉大的作品，而是由於他們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偉大的人民的愛。

九一八以後的十年中，由於韜奮和無數愛國者的不斷的呼號，引起了『一二九』的北平學生運動，促成全國各階層各黨派團結合作，抗日救亡。一方面挽救了民族的危機，另一方面掀起了爭民主的浪潮。這民主運動雖然直到現在並未獲得完全勝利，却已成爲不可遏止的巨大潮流了。在這中間，中國知識份子盡了最大的努力，而韜奮是其中重要的一個。

因此，十五年前我對知識份子觀點是不能成立了。雖然甘心替權貴幫閒，甘心當奴隸總管的知

識份子，依然到處存在着，而且變本加厲，有的居然改充特務了。但是中國民主革命一日未完成，大部分知識份子，良心一日不會滅絕。在目前的反內戰反獨裁鬥爭中，全國文化界人士依然是站在最前線的。記得在生活週刊時代，從事實際救亡運動的還只限於一部分青年學生界。而現在則連六七十歲的老學者，老教授都冒着生命危險去參加和平請願。馬敘倫老先生都是在領導反內戰大遊行。誰能說時代沒有進步？誰能說知識份子是永遠脫離大衆的？

不過，民主陣線的損失，不能不算得十分慘重。韜奮去世已經兩年了。杜重遠先生被盛世才戕害。此刻傳來惡耗，李公樸先生又遭毒手。這種窮兇極惡的罪行，會燃着全國廣大人民的怒火。無數愛國者所流的鮮血，總有一日培養成燦爛自由之花。正如法國人所說：

Les hommes Passent,

La France reste.

我願以此二語，慰亡友在天之靈。

三五、七、一五於新加坡

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的模範

沈志遠

近來有好些自命爲『自由主義者』的人，在紛紛發表其『自由主義』的政治言論。在一些民主刊物上，也有人在討論自由主義者的問題。有些人無論在言論上或行動上，已經公然在替眼前這種爲全國人民所唾棄的反動獨裁統治，扮演其『跑龍套』的甚至於幫兇的角色，然而他們都要自命爲『自由主義者』。有些人一面鑒於反動派統治的行將崩潰，一面又看到人民的革命怒潮行將這冲倒個反動寶座而成爲國家社會的主宰者，他們裝着『悲天憫人』的態度，拍拍胸膛揚言要挽救『社會秩序』的『大混亂』，挽救『文化傳統』的『總毀滅』，於是他們便以哀求的姿態，向這賣國殘民的腐敗統治要求給他們以有利於這統治的『反對派』地位，爲的是要在保存現制度的基礎上，通過『反對派』的批評督促，以實現政治的改革（？）而達到上述的『挽救』；這種人卻也自命爲『自由主義者』。

這樣的人能不能稱是自由主義者呢？究竟要怎樣才能算是一個眞正的自由主義者呢？我以爲這

樣的人是一點自由主義的氣味都沒有的，因爲——

一個眞正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同時是個堅決的民主主義者；旣是個堅決的民主主義者，那麼替反動獨裁統治扮演『跑龍套』或幫兇的角色，固然根本談不到什麼自由主義（而且實際顯然是自由主義的敵人），即那班以挽救『混亂』保衛『傳統』爲己任的『悲天憫人』之徒，也還是與自由主義相距南轅而北轍。這班人以爲目前政治的腐敗，並不是由於反動派獨裁統治的本身及其基本政策不行，而祗是執行政策者的腐敗或行政制度的不行所致。所以他們改革政治的主張，是以維持現存的傳統體制（即整個政治制度）爲前提，亦即以挽救這崩潰中的獨裁統治爲使命的。充其量，他們不過想給這獨裁統治披上一件比『三黨聯合』的內閣稍微像樣一點的『民主』外衣而已。試問這是什麼民主主義者？還是什麼自由主義者呢？

其次，一個眞正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同時是個人民利益的堅決擁護者。歐美政治學說中的所謂『以最大多數的最大福利爲依歸的政治』這一原則，就是指的這點意思。假使口頭上高唱『最大多數的最大福利』，而實際主張和行動上却因懼怕『最大多數』而企圖阻止或避免『最大多數』的自覺自決運動（在今天的中國是新的民主革命運動），那就是『最大……最大……』原則的假冒者，不是人民利益的擁護者而是它的反對者，也就不配做一個自由主義者。

再次，一個自由主義者必須同時是一個眞理的熱愛者，一個虔誠的理性主義者。由於這，明是非，重正義，是一個眞正自由主義者的最起碼但又最神聖的條件。因爲要在中國現實的政治局勢下做到明是非，就不可能在民主與反民主的夾縫中尋求一條折中或中立的路線，像又一些有問題的自由主義者之所幻想。倘事實不可能而硬要想虛構一條中立路線出來（當然這里說的是政治路線，組織上的第三方面或中間黨派是可能存在而且事實上存在的），結果至少必然是混淆是非削弱民主，乃至客觀上爲反民主壯聲勢，正義也就成了問題，這樣一種企圖在眞理與反眞理，理性與反理性之間從事折中的人，是什麽自由主義者呢？

最後，我想說的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第四個必要條件，是站在時代前列，不斷地求進步，而不能是畏首畏尾，死抱住舊的不放，而害怕新的崛起。換言之，一個眞正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同時是個時代的進步份子，而不能是個保守份子。自由主義之誕生，本來是以反專制黑暗，反封建保守的戰鬥員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舞台的。所以自由主義之被人重視，它的光輝的歷史功績，主要地正在這一點上。在今天的中國（同樣的，在今天的世界），大家都明白誰是當前反法西斯獨裁的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導力量，眞正進步的自由主義勢力祇有跟這一主導力量結成親密的聯盟，才能成爲當前中國民主運動中的重要的積極因素。反之，自由主義離開了這種主導力量，就會一件事也做不成功

的，而且祇會落到運動的後面去，卒至被民主的時代潮流所淘汰。

如何做一個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呢？最好是以三年前逝世的鄒韜奮先生來做榜樣。

韜奮先生是一位堅決的戰鬥的民主主義者。自他參加救國運動的日子起，直到他最後的一口呼吸以前止，他對中國的民主鬥爭始終是站在最前線的。對於反民主勢力的威迫利誘，始終沒有表示過絲毫的動搖；他對反動腐敗的獨裁統治，從來不寄於任何的希望。他因為不願與這一統治妥協而甯肯眼看他十餘年來艱苦經營起來的事業被摧毀，甚至甯肯冒着生命的危險而度其萬分困苦的流亡生活。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者的韜奮先生，同時又是一位人民利益的積極擁護者。他所不顧一切以爭取的民主主義，無疑地是人民大衆的民主主義。不像那些『最大多數的最大福利』的空喊者，韜奮先生是在實際的主張和行動上為人民大衆的解放事業而貢獻其全力的。既是一位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和人民大衆主義者，他同時必然是個眞理和理性的熱愛者，也必然是個站在時代最前線的戰士。對民主與反民主，對人民與反人民，對進步與倒退，對是與非，他的態度是非常明確，毫不含糊的。他痛恨頑固保守，他歡迎革新前進。當他不是一個馬列主義者時，由於他酷愛眞理及忠誠于人民解放事業的高度熱忱，他對馬列主義及其集團，抱着熱烈的同情和虛心學習的態度。

因此，祇有像韜奮先生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才是今天中國（乃至世界）所最需要的眞正的自由

主義者。韜奮先生才有資格成爲歷史現階段的自由主義者的優秀的模範。我們在悼念這位偉大的自由主義者時，謹願全國一切眞正的自由主義者和一切進步的知識份子，都踏着韜奮先生的道路，堅定地前進！

三十六年六月三十日，於香島。

我們要學習韜奮精神

胡仲持

韜奮先生是從中國偉大的鬥爭時代孕育出來的最可寶貴的天才。他從教會大學造就了高深的近代學問和外國語文的基礎。如果單只爲了個人的幸福打算，他原也有着求名求利的許多出路。但是他對祖國命運的過人的關心，他對人民大衆的火一般的熱愛，却使他不覺地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和全部事業奉獻於民族解放鬥爭，他寧願辭去了一家大報館的記者職位，自己來創辦一個只賣幾個銅子一份的小小週刊，爲的是自己辦的刊物才可以暢快地爲大衆說話，受大衆歡迎。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生活週刊』的經營上頭。他經常寫着通俗的語文，所探討的問題有極重大的國際事情，也有極細小的個人生活上的小糾紛。這一週刊在上海，在全國，逐漸擴大了銷路，原因就在他肯講各大報所不敢講的話，它能够對生活苦悶的青年讀者給予適當的有益的指導。在全盛時期，銷數甚至超過『新聞報』，每期達二十萬份以上。於是，『生活週刊』不再是自給自足的小規模的事業，一躍而爲和各大報相抗衡而有穩定的盈利的全國性企業了。隨着『生活週刊』影響的擴大，韜奮先生的

聲望高起來，上海的文化人漸漸聚集在他周圍，他成為文化界中心人物了。他的「生活週刊」全憑盈利的積累，發展而成為生活書店。

我們知道韜奮先生不僅是一位優秀的雜誌編輯和書店總經理，他也還積極參加了爭取祖國獨立民主的政治鬥爭。他和沈鈞儒李公樸諸先生組織了救國會，堅持團結抗日的統一戰線。正惟如此，他的命運正同歷來一切大革命家一樣，充滿了各種的困苦顛連。他不但自身遭受了監禁和流亡等等的痛苦，而且他辦的刊物被查禁，他所經營的事業也受了牽累。

他把自身的生活和事業奉獻於祖國解放鬥爭的偉大革命精神是值得天下後世永久敬仰的。現在他已經死了，他的事業在政治的阻力下似乎也不易復振起來。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他的道德文章和他的文化事業的影響已經遍布於全國了，這深入人心的廣大影響決不是用任何政治的恐怖手段所可摧毀的。什麼使他二十年來的文化工作發生了這麼廣大深刻的社會影響呢？顯然是他的真誠坦白刻苦所礪的做人治事的精神。作為平凡的文化工作者的我們所應向韜奮先生學習的就是這一種精神。現在分三方面來說明一番罷。

（一）他的學習精神，是每個和他相識的人佩服的。他讀書又博又精，大家都知道，但他從不自滿。他對任何一個人文化界朋友老是問這問那，為的是要把所關心的某一問題弄得清清楚楚，在

時事學術或業務性質的任何討論會中間，他照例全神貫注地傾聽着每一個朋友的發表的意見，到後來他自己發表意見時，從不會把當場所討論的要點漏掉一個。他雖然工作忙，也還常抽時間讀國外出版的新刊新書。就我所知，自從他出洋回國以後，他對於英美新出版的進步的社會科學著作，一直有着先睹為快的熱望。記得有一次，朋友們聚在一起閑談，一個朋友剛提到西書店中新到一本什麼書，韜奮先生就說看過了，其中有幾點觀點不够正確。原來他所得到的一本是從外國航空寄來的。在蘇州監獄期間，他天天讀名著做筆記，有時為了要參考，開出一張書單來，託外邊朋友向各處借。他的讀書慾無疑地是十分旺盛的。但我們要知道，他決不是賣弄書本知識的學究。他是能把書本知識和社會經驗結合起來，靠思想能力加以貫通的。誰能否認多年『生活週刊』的編者是精通這一世代的中國社會現象的專家呢？他是一方面向有國際權威的學者們學習，另一方面又向受苦難的中國人民學習的。他基本的學習態度就是謙虛。

（二）和他學習態度的謙虛相配合的是他工作態度的認眞。每一個文化工作者對于韜奮先生的工作精神是不能不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在他主編刊物時，他不但注意內容的精采和充實，而且毫不忽略紙面的勻整和美觀。在發稿前，照例是精確地計算每篇稿件的字數的。他針對當前的時事問題寫指導性的言論，又細看每一個讀者的來信，親自作懇摯的答覆。他不肯讓他的刊物上發現一個錯

字，在付印的前一天，親自留在印刷所監督拚版，并且校看清樣。因這種絲毫不苟的對讀者負責的認眞功夫使他所辦刊物從不脫期一次，使它的發行額每期都有增加，又使它的一般讀者對編者發生親切的感情。韜奮先生的名字所以能深印在中國青年們心頭的原因，可以說多半是從他的工作精神出發的。

（三）還有，他的領導作風也值得我們注意。他是他所手創的生活書店的總經理，誰都知道生活書店儘管在當局文化統制政策之下遭受過無情的摧殘，終究是從四萬元的小資本的基礎做起，而能在中國文化界放出無限的光芒。這一事業的發展和成功，當然是編輯營業各部門全體同人和作家的集體努力的結果，但首先不得不歸功于韜奮先生的領導能力。韜奮先生是用親愛的精神來領導他的事業的。他辦生活書店的宗旨又是以眞正國家社會的利益爲前提的，而事業的利潤不過是附帶的目標。這一種偉大的胸襟可以說是他的事業的發展和成功的眞實的基礎。他採取民主作風來管理整個事業，把作爲總經理的自己的權限定得很狹小。他使每一職工都成爲書店的股東，而且親切地關顧他們的生活和學習。這麼一來，當然參加事業的同仁能够各自機動地發展其才智，使事業有飛躍的發展了。

今日在政治阻力下奮鬥着的中國文化工作者大家走着韜奮先生所走的道路，但在學習，工作，

領導方面中能够追得上韜奮先生的功夫的，我看實在太少了。大家加緊向這位偉大的前驅者學習吧。我願在此套用郭沫若先生論魯迅的一句話，來預祝中國文化界的前途：『韜奮以後，中國會有千千萬萬個的韜奮的。』

韜奮先生的幹部政策

孫起孟

韜奮先生是中國近代的一個巨人，他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面旗幟。我確信，一侯政治環境順轉，韜奮先生一生進步的歷程必然成爲廣大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研習的重要資料。

談到韜奮先生治學爲人的文字已經很多，我感觸甚深的此短文中只能簡略一提的是他的幹部政策。

生活書店是韜奮先生畢生精力貫注的事業，要看他對於幹部政策的見解和運用，這是個最具體的證物。我們且不談生活書店的書刊發生了多大的影響，先談到新出版業，中上級幹部很多都是生活書店出身這一點，就足以證明韜奮先生領導的成功。我很欣幸，有極多機會接觸到生活書店的青年幹部。憑實說，他們的基本修養未必高過別人，內中有一部分人從沒有受過什麼中等以上的敎育，資質品性也並無特異之處。但一經在生活航過幾年，幾乎個個在知能上，在見解上，在工作的熱情上，都呈現出飛躍的進步。前不久還聽得生活的一位老幹部用甜蜜回憶的口吻大談韜奮先生的

律己之嚴，治事之勤，愛人之誠，知人之明，以及這種領導作風的感人之深。他的全部經綸，都明載於『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一書中。要言之，他的成功祕訣就是他的實行事業的民主。以大衆的事為主，不以個人的事為主，這是他事業理想的民主；以參與事工的幹部為主，不以自己為主，這是他事業管理的民主。把握住了這樣兩個原則，韜奮先生一無憑藉的創辦了生活書店，使這個事業一天一天地發達起來，即使在他身後，『生活』這塊招牌只有格外輝煌，進步無疆。

在純粹私人管理的事業單位中，自始至終向進步的目標奔赴，為人民忠誠服務，卻又能歷盡艱險，不給惡勢力衝倒，屹然長存並且表示了極大事業成績的，生活書店總要算是第一名吧。憑什麼能如此？在許多因素中，韜奮先生的領導作風和幹部的政策，我認為是極其重要的一端。

今天有很多人在談民主，而且還有機會在領導事工。學力能力在韜奮先生以上的當然不至於沒有，但關於幹部政策，能有他這樣的眼光和手法的，恕我孤陋寡聞，實在還未多見。我個人的淺識，總以為：眞正理解民主的人必然懂得幹部政策。幹部都不知道愛惜尊重，談什麼對羣衆愛惜尊重？幹部都不願接近理解，談什麼理解羣衆？眞正有民主眼光的人一定以幹部為自己的腦髓，看幹部像自己的生命，決不會還在那裏走奴役幹部御用幹部的老路。所可惋惜的是今天在政治或社會方面，至少有一部分人的起着領導作用，並不是由於他們在羣衆隊伍裏建立了工作信譽，而是由於他

們的『資深望重』。這樣的人頗多是不習慣於過集體生活的，所以他們根本不瞭解幹部是什麼，他們只是個人奮鬥，用一句時行話，叫作『盡其在我』。果然，這樣的人也可能在社會上做出了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來，但是，『我盡』的時候，事業也就隨之而消竭。這是社會的損失，也是個人的悲劇。

韜奮先生在這一點上給我們立下了最好的榜樣。事實勝於一切宣傳：生活書店活生生的存在着，發展着，並沒有因爲他的死去而就走樣乃至煙消雲散。我敢斷定，要是韜奮先生的幹部政策能够保持和發揚下去，這個事業單位裏還有比韜奮先生作過的更有意義的事情作出來，還有勝過韜奮先生的人才成長出來，這不是韜奮先生的弱點，這正是韜奮先生的不朽和成功。

韜奮的三個特點

楊衛玉

三年前韜奮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到了重慶以後，吾曾寫過兩篇文字，表示哀悼，兩文中都有「韜奮愛國最熱心，主張抗戰最力，而不能目覩勝利當為大憾事」。現在想來，吾這幾句話，可以說多餘的，不但是多餘且適得其反，試問我們一般活着而看到「勝利」的人，現在的情緒，環境怎樣呢？光陰過得很快，韜奮逝世三周年了，以吾與他交友之久，情誼之深，應該如何表示吾的內心之哀悼？但擺在我們目前的悲哀事情太多了，吾也何必再寫徒增心酸無補事實的文字呢，但是吾又何忍不寫幾句來紀念他呢，且把想到他的三個特點，寫在下面。

熱情　吾友好中熱情的，固然不乏其人，而最高的要算韜奮，我們平時在一起的時候，隨時隨地，都可看見他眞情熱誠的流露，無論為國家，為社會，為家庭，為同事，為親友而表現的熱情故事，眞是不勝枚舉，現在只舉一兩件對吾的熱情事實。在民國十二年的冬天吾的先室逝世以後，吾獨居在上海西門外職教社之一角小樓，他每天晚上必來看吾一次，有時且同了他的前夫人葉女士

同來，想出種種方法，百詞以安慰吾，翌年秋天吾在蘇州舉行續弦訂婚禮，他夫婦二人，請了假冒了大雨，特地自滬到蘇參加我們的典禮，并且發表了許多動聽的說話。還有一次，彷彿在民國十四年的時候，他和吾同到濟南，同寓在濟南閣公祠改建的正誼中學，明天要動身回滬，而大雨傾盆，街上水深沒踝，丙子託我買的府綢，非買不可，而吾無雨具，他竟毅然為吾去買，這種舍己為人的熱情，天下有幾個人可及呢？此情此景，吾永遠不會忘記的。

專一　由於他的熱情負責任，每做一事，必定專心一致，孜孜研究，務求盡善盡美，尤其在主編『生活』週刊的時期，屏絕一切無謂應酬與次要事情，日以繼夜，有時手不停揮，有時手不釋卷，在他工作的時候，大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之概。他為了『生活』對外不講演，不作文，一心一意為了『生活』。他不但對於工作這樣，有時對於娛樂消遣的事情也是這樣。曾經有一個短時期，他忽然喜歡跳舞，他工作之餘，獨自在房內，婆娑起舞，有時抱了一隻椅子，嘴裏『蓬拆』『蓬拆』的盤旋而舞。即此小小的事情，他還有這樣專一的精神，所以他無論寫一篇文章，譯一本書，做一件事，自然精心結構，無懈可擊。他的威名，他的成功，專一的精神，是一個重大的因素。

坦白　凡有思想而善考慮的人，往往缺少坦白的真誠，韜奮是富有思想的人，而其坦白真誠，

有爲人所不及者，眞能做到事必求是，理必求眞，從無取巧虛僞的言行。曾憶有一天晚上與同事某君略有誤會，竟至拍案大罵，雙方聲言辭職，幾乎有勢不兩立之情形，吾正爲此焦急，怎樣可以調解，使他們言歸於好。翌日大早，韜奮到吾家來，見面就哈哈大笑，連說抱歉抱歉，誤會了誤會了，正在此時某君來了，韜奮趨前握手，自承昨天之孟浪，某君初尚有不豫之色，至此亦破顏微笑，互道歉意，相偕至辦公室，同事都爲之粲然，事後某君常對吾說韜奮眞够偉大，吾亦自嘆弗如。

以上所述三點，看來平淡無奇，做到眞不容易，吾數十年來交友不爲不多，如韜奮之爲人並不多見，感懷所及，略記如此。

記香港戰爭時韜奮的瑣事

茅盾

在香港戰爭時和韜奮先生最後一次的晤談是十二月十一或十二的午後，堅尼地道我的寓樓。十二月八日，戰事爆發後，住在九龍的朋友們都陸續逃到香港來了，韜奮想看看堅尼地道我的寓所也是否「安全」。當然，如果日本人進了香港，那麼，我這寓所一定不能再用。不，即使日本人還沒進香港而戰事日益不利，我這寓所也未必「安全」；因爲才只打了兩三天而已，而日本人的間諜和漢奸在香港已很活躍了。當韜奮了解了這樣的情形時，他就頗爲躊躇了。九龍來的朋友（連韜奮也在內），本來已經看好了一所屋子，但只是空空蕩蕩兩間大房，什麼也沒有。這就是韜奮來到我處看看的原因。但我還是請他住下來再說，而他們也同意。

這時他還沒吃過中飯。我們就把冷飯炒起來，他一面吃，一面說：「那邊，（指他們已經看好的那屋子——筆者）連一口開水也弄不到；我們每人倒都有熱水瓶，可是沒有風爐和水壺，沒有法子燒水。」

談到九龍的戰事，他慨歎於元朗一線之不能久守。『想不到這樣快的，這樣快的。』他說：

看見我們書架上依然是滿滿的書籍，他就問道：『這些書，都不要緊麼？』

『難說，』我回答，『多少總有點抗日的嫌疑。』

『怎麼辦呢？』他很關切又很天眞地問。

『明天想法搬到別處去。』

沉默了一會，他又說：『這樣的事，我還是第一回，一點經驗也沒有。』看見我望住他微笑地點頭，他又補充道：『當眞沒有經驗，人家告訴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你看我學得會麼？』說着他自己笑了，這笑是非常天眞的。

『當然，』我也笑了，『包你一學就會。』

『不過，我是粗心的。日常生活的瑣屑事務，一向都是粹縝（他的太太的名字——筆者）照料我的。』

我笑了。他也想起了什麼似的拍着身上的背心笑了起來。

原來他還背心口袋裏裝着鈔票，爲防掉落，袋口有線縫住，——當然這是細心的太太爲他這樣準備好的，然而他來到我寓所以後上一次毛廁，出來時可就把這件背心忘掉在毛廁內衣鈎上了，幸

而我們跟着就發見了，總算沒有被房東的用人們順手牽了羊去。

「果然有點粗心，」我說，「但這是你的細心的太太養成你的。」

「以後跟你們學罷。」他說，又高興地笑了。

半小時以後，來了一個朋友，是來找韜奮的。據他說，九龍吃緊，說不定今晚即會不守，而香港之能否堅持多少日子，也正未可知。「你住在這裏是不妥當的，」那朋友對韜奮說。

「那麽住什麽地方呢？」

「還是那兩間空房間。雖然不大方便，問題是沒有的。」

「好，好，」韜奮完全贊同，又邀我也去，「你也到那邊去罷，房間大得很，打地鋪，再多幾個也住得下去。」

我辭謝了他的好意。我告訴他：我本來要搬下山去，房子已經在找了，我得等候朋友的回音。

「那麽，要是回音來了找不到，你還是到我們這邊去。」他邊走邊叮囑就和那朋友一同去了。

那天晚上，我就搬下山，住在一家暫時歇業的跳舞學校內。

以後，香港淪陷了，又過了新年了，正月九日，我們偷過九龍，準備取道陸路回祖國，在船上又和韜奮遇見了。這時他穿了唐裝，很高興，他指着他那大褲管問我道：「看得出麽？——一枝自

來水筆，一只手錶，在這邊；那邊是鈔票，都是粹繽縫的。』他又天眞地笑了。……

這一切，回憶起來，歷歷都如在目前。然而不幸韜奮離開我們已經有三年了。認識了眞理的人，雖處危難，却能樂觀，韜奮在香港淪陷之時，誠如他自己所說，他對於這種顚沛流離的生活尙無經驗，但他旣不喊苦，更不悲觀，他在瑣屑的日常生活上也眞想學學向來所未嘗躬親的，從這些小地方，也可見他之爲人，也可供年青的一代作模範。韜奮的思想發展的過程，他的認識眞理的過程，我們在他的著作中歷歷可指數，而他的一切美德則可以兩字概括：誠與眞。我們要向他學習的，固然很多，然而如果誠與眞尙不足，則亦不是善於學習韜奮。願景慕韜奮者，記取他這誠與眞。

韜奮先生印象

郭沫若

瀛談百代傳鄒子，
信史千秋哭賈生。

這是我在一九四四年寫的輓韜奮先生的一付對聯，因爲那年的九月一日在重慶的朋友們要開會追悼，我趕着寫出來的。我還記得是用一張四尺宣紙對劃開來，寫上的。這聯辭在我自己認爲表示得比較貼切，不過由別的朋友看來，或許會感覺它的浮泛吧。

我和韜奮先生相識是在七七事變以後。在這之前韜奮在輿論界、文化界，崢嶸地奮鬥着的時候，我正亡命在日本。當時是遠遠地但卻興奮地瞻仰着下風。事變後在七月二十七日我回到上海，我們雖然同在上海住過一段時期，但因爲各忙着各的工作，很少接近。在上海成爲孤島之後，我們是同一隻船撤退的。那是一隻法國船，船名我不能記憶了。那隻船差不多滿載着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廖夫人何香凝先生是在這隻船上的，韜奮先生，金仲華先生，還有好些熟朋友都在這隻船上。

開船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我記得很清楚。就在這一天，在開船後，韜奮先生和我在二層的甲板上品排着走來走去，一面走一面說，說了將近有一個鐘頭的光景。這可以說是我同韜奮先生最親密地談話的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們雖然是同船到香港，但我在香港暫時留下了。韜奮先生則和別的朋友經由廣州梧州直往桂林，再由桂林轉達武漢。後來我也到了武漢。在抗戰初期我們雖然同在武漢，武漢撤退後又同在重慶聚會過，但我們見面作單獨談話的機會很少，甚至可以說不曾有過。因此，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船上邂逅的那一段紀念，留在我的腦裏最深。

那時我們還懷抱着許多幻想。我那時很想到南洋，因爲韜奮先生到過南洋，我便請教了一些那方面的情形，同時又談到蘇聯和其它的國際形勢。韜奮先生對於桂林和新疆方面的工作也抱着很大的希望，認爲從邊疆着手，可以促進現代中國的全面化，神聖抗戰的全民化。南洋我沒有去成，韜奮先生對於邊疆的希望後來也成了泡影，但我們在船上的那一段談話是使我永不能忘記的。我那對詩中所說的「漫談」，與其說是從韜奮先生的著書如「萍踪寄語」或「蘇聯的民主」之類得來的印象，認眞說主要就是指我們的那一段談話。

我比韜奮先生爲鄒衍，或許有人以爲只切到一個「鄒」字吧，更或許會有人感到瞠惑，怎麼竟把現實明朗的韜奮先生和陰陽五行的怪論家相比？這個我須得加以說明。鄒衍，在我認爲正是一位

現實明朗的有氣魄的一位學者。他的著書可惜失傳了，剩下的遺說，驟看好像是誇誕，但他所討論的範圍是限於歷史與地理，而方法是由小以驗大。雖然多少不免失之誇張，但在兩千多年前他就預青到整個地球的一個近似的情況，那倒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尤其是他把陰陽對立而生變化以說明歷史的演變，以簡單的原素週期律——五行的生尅來肯定革命的可能，這是更有遠見的驚人的宏論。可惜當時實驗的工具不够，沒有人來實驗他的大九州之說，那簡單的原素週期律也沒有更細密地推進，而且變了質而已。陰陽五行之成爲了怪論只能怪秦漢的一些『不通』的方士，鄒衍是不能負責的。在這注重歷史與地理的現實立場，而眼光宏闊可以開拓百代的心胸這一點上，我認爲以鄒衍來比韜奮，是再貼切也不過，對於韜奮我並不敢有所辱沒。

韜奮先生是最關心靑年的人，他眞是一位理想的靑年導師。而韜奮先生所給人的印象，特別在我的心目中，也始終顯得是一位靑年。不僅他的精神是那麼年靑，就是他的面貌，風度也總是那麼年靑。他的身裁適中，面目秀麗，口齒清白，態度純眞，我始終感覺着他只有三十歲左右那樣的年齡。我相信別的朋友對於這一層一定也有共感吧。而韜奮先生是極熱忱的愛國者，他的文章有神，爲國事慷慨陳辭，感人至深也至廣，這更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因爲韜奮先生給我的印象那麼年靑，而痛陳國事的文字又那麼磅礴有力，所以我印象的地感覺着他就像漢朝的賈誼。賈誼，這是我們中

國歷史上永遠年青的愛國政治家，他的痛哭流涕的『陳政事疏』到今天都還感動人，他的年齡雖然隔了二千年，依然被人稱爲『生』而感覺着親愛。我對於韜奮先生也正有這同樣的感覺，我相信百代的後人也永遠會把韜奮先生當成爲一位青年的吧。

但賈生爲時代所限，不免感情用事，只是偏於愛國，偏於愛當時的王室，而韜奮先生自然是遠遠地超過了他。韜奮先生是在理智的光中汎愛人民的。雖然也熱忱愛國，而韜奮先生愛的是人民的國。要把鄭衍和賈誼加攏來才把韜奮先生的印象表示得比較完全。但也只是比較的而已。韜奮先生本質是革命家。革命家的韜奮先生就是革命家的韜奮先生，那是前無古人的。

我是不是應該『哭』韜奮呢？或許不應該，因爲韜奮是永生了，他在歷史上永遠不會死。但我在感情上依然要『哭』，就在今天我也想『哭』。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在重慶銀社追悼韜奮先生的大會上，我有一篇哭先生的哀辭，那是最懇切的心聲，我記得當時到會的幾千人都是曾經同聲一哭的。

我不感覺慚愧，我要含着眼淚作一個韜奮先生的誠實的學生。

從平凡處追念他的偉大

王造時

關於韜奮兄對於民族，尤其在文化方面的貢獻，寫的說的太多了，或許從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更能看出他的偉大罷。

現在從事文化工作，特別是政治運動的人們，有的『吊兒郎當』，態度不謹嚴；有的行爲浪漫，不檢點，私生活一塌糊塗；有的對人處事，太苛刻，太虛僞，缺乏熱情和誠意；有的個人英雄主義太重，只顧自我宣傳，不顧大體，凡出風頭的事情，總要站在人家的前面；有的對國事，視同把戲，玩玩政治，心裏並沒有那般『忠誠耿耿』之氣。

可是，我們這位朋友，韜奮兄，確不是這麼一個人。

他的生活態度是謹嚴的，工作是有計劃的。什麼時候吃飯，睡覺，休息；尤其是什麼時候寫作，看書，或處理事務是有規定的。例如在蘇州監獄裏，寫的那兩本書，『經歷』與『讀書偶譯』，事先便規定了書的大概內容，總共要寫多少字，每天要寫多少字；開始以後，他就每天非趕完他的

工作，不肯罷手；決不是『心血來潮』便拚命寫一陣，不高興便丟開不去理會。

如果勵志社的教條眞是要履行的，而不是寫在牆上或貼在壁上的幌子，只有韜奮兒够格做一個社員；如果依民主方式選舉會長的話，我一定投他一票。他既不抽煙，又不喝酒，更不嫖賭，沒有一點不良嗜好，確是文質彬彬的一位君子人也。

他的家庭原來是很愉快的，他之愛太太，與太太之愛他，都是專一而純潔的。家庭的事，他不大管，幾全信賴他的太太。嫂夫人沈粹縝女士眞是一位賢妻良母，同時却是一個識大體明大義的愛國者。她對於韜奮兒的照料，關切，同情，安慰，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她這種溫情是我活到現在爲止所僅見的。天冷了，她怕他衣着的太薄；吃飯，總要多給他一點滋養品；遇到困難，她給他以慰藉。『仁慈』和『溫厚』是粹縝嫂夫人的德性，也是人類最高的德性。

一個人的行爲如果謹嚴，往往流於呆板。但韜奮兒却是那麼天眞，活潑，熱情。對於朋友，尤其是靑年朋友是那麼誠懇。你講話，他傾聽；你有困難，他同情地和你商量。如果見解不同，他和你辯，辯得面紅耳赤，過後又是和藹如初。他沒有一點架子，根本不懂得怎樣擺架子。他一點也不虛僞，因爲他絲毫沒有虛僞。在蘇州，被翁檢察官偵查時，他說明了聯合陣線與人民陣線的分別以後，那位姓翁的硬要栽他是主張人民陣線，並說了他一句『言不由衷』。他氣急了，跳起來，連聲大

呼『抗議，抗議，抗議檢察官的無理』。這樣的激動，正表示他的眞情，而他的眞情是向來不說假話。

民國二十九年夏，我因爲代表國民參政會參加軍風紀巡察團，巡視第九戰區，到了贛北的最前線的高安上高一帶，受了暑，生大病，回到原籍安福休養一個多月，與外面不通消息。忽然國內外的報紙登出了圍黑框框的新聞，說我死了；敵人並且加油加醋像煞有介事的來一個廣播，說我在前方巡察時，被『我機掃射受重傷不治而逝』。許多朋友都爲這條消息着急，嘆息，傷心。韜奮兄就是其中最關切我的一個。在安福，我的太太，忽然接到好些電報，詢問我的究竟，其中就有他發來的一個『造時兄安否』。不久我到了重慶出席參政會，久別重逢，又驚又喜之下，他高興極了，緊握着我的手不放，連說『你好，你好，你沒有死，幾乎把我們急死了』。一片眞誠，萬般友誼，我感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文人而又政治慾望强的人，往往除了認定『自己的文章好』以外，還帶有强烈的個人英雄主義，甚至不惜排擠人家，爬到人家的頭上過去。遇到出風頭的機會，則一馬爭先。但韜奮兄沒有這種毛病。他文名滿天下，自己並不覺得『神氣』，不像有些人架子十足，自以爲了不得。小事例如簽名照相。有些人非簽在前面或站在前面不可；他隨便，甯願簽在後面或站在後面。不懂得的，他決

不曾充懂得。在寫『讀書偶譯』那本書的時候，有幾個地方，他不惜兩次三番同我商量。

在這個過渡的變態社會裏，不免有這種情形。有些人開口民主，閉口民主，而行爲習慣與思想方法很不民主。或是獨斷獨行，唯我獨尊；或是派系觀念很强，進行祕密小組；或是拿着關門主義，拒人於千里之外；或是偏狹自私，胸不容物。這些都是民主運動的障礙。而韜奮兄由於他的學養的深厚，絲毫不犯這些錯誤。對於民主，他是言行能够一致的。他能以說服的態度，堅持自己的主張；他也能以謙虛的胸懷，接受人家的意見；他更能服從多數，拋棄自己的成見。他絕不排擠人，傾軋人，他能顧大體。

他對國事的熱，對大衆的愛是誠摯的；參加政治運動，態度是嚴肅的，認眞的，决不把政治當做『玩藝』來耍一番。其實他主要的興趣在寫作，對實際政治活動興趣並不濃厚。他之參加救國會運動完全是鑒於國家危亡，間不容髮，乃挺身而出。

紀念韜奮先生

周建人

我認識韜奮先生是在『一二八』日本法西斯軍隊進攻上海這年的秋天。那時他正在辦『生活週刊』。他辦事勤奮不倦，出版從不脫期；寫的文章又明白曉暢，親切感人，這份刊物遂大受讀者歡迎，每期銷十多萬份，恐怕上海的定期刊物少有比得上它的。

以後他一逕這樣熱心地，一刻不懈怠地幹着進步的文化事業。我經常看見他在寫文章指導青年，解答疑問，幾乎不看見他在與人『唉長氣急』地論爭。但是即使如此，在難做人的中國社會裏，有時還會被人說他偏袒我的意見而受到攻擊的。但這種事情說起來話太長，而且比之於目前許多事情太小，且按下不說它。

後來，他終於離開了上海了。

後來聽說他又回到了上海，因患腦癌症在醫院裏醫治。終於在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病重去世。不料倏忽已經三週年了。自韜奮先生死後，總留着這樣一種感覺：總覺得社會上缺了這樣一個

熱心做事的人。還損失好像是不容易彌補似的！

死的征服力量

平心

記得十年前韜奮先生在魯迅先生公祭大會上發表了最簡短的演說：

今天天色不早，我願用一句話來紀念魯迅先生：許多人是不戰而屈，魯迅先生是戰而不屈。

這「戰而不屈」四字，今天借用來表彰當時的發言人，我想是最再恰當沒有的。

韜奮先生繼承了中國正直知識份子最優美的道德傳統，同時又接受了世界最進步的革命學說與民主德操；他的追求眞理與保衞正義的精神成了廣大青年的照明力量；他一經選定了自己的道路，就以百折不囘的毅力向前馳驅。就是這風範使他成爲不朽的民主戰士，他是用全副生命來實踐「戰而不屈」的精神的。

韜奮先生在生時，對權貴抗爭，對貪官汚吏抗爭，對日寇抗爭，對反民主集團抗爭，爲了中國的民主利益，他拒絕與任何卑汚勢力妥協，他拋棄別人求之不得的名位，却決不放棄爲人民發言的權利，他的敵人澈骨地恨他，而無數的靑年與受難者對他表示了無限的敬愛，這是韜奮先生的勝

利。

韜奮先生在事業上成功的重大因素，除了不屈的戰鬬精神外，還有兩點值得指出的，這就是臨事不苟與待人以誠。他編輯雜誌，開辦書店，辦報，參加民生愛國運動，處處表現驚人的負責精神，例如他辦『生活周刊』多年，從來不會脫過一次期。據說，他常常深夜在印刷所工作，有時還親自校對，在可能範圍內決不讓刊物錯一個字。有一次『生活』公開募集救國捐，援濟東北局部抗戰的將士，各界人士捐款極爲踴躍。期滿，他將全部捐款匯出，編成詳細的徵信錄，請會計師審查，正式公布。不料事後竟有宵小造謠，誹謗他的人格；凡深知先生爲人的友好，莫不憤慨萬分。先生聽到這類卑污蜚語，只是付之一笑，他的負責治事不計毀譽的君子風度給我的印象極深。我有時遭到誣詬，一想起先生的豁達大度，就忘記了憤怒。

一個爲眞理而戰的志士，必定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現最高的眞誠，韜奮先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凡與他共事的人，不論職位高下，是決不會忘記他的懇切謙和的風度的。他對事處處從誠出發，對人處處從愛出發，他樂於爲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們服務，而從來沒有德色。他最痛恨的是自私自利盛氣凌人的小人物，最歡喜的是大公無私的民主作風。

韜奮先生精神上的戰鬥力遠超於他的肉體上的戰鬬力，他可以戰勝政治上社會上的頑敵，却抵

抗不了使犯他的病痛。人類殺人的能力至今還勝於救人的能力，以致征服不了毀滅大量生靈的瘟疫，而我們的「戰而不屈」的鬪士終於給這可惱的不治之症奪去了光輝的生命。

然而死只不過征服了韜奮先生的形骸，他的永生精神體現在人民大衆的民主事業中，却成了死的征服力量。

我們要宏揚韜奮先生爲大衆民主生活戰而不屈的强毅精神，擴大死的征服力量！

鄒韜奮先生逝世三周紀念誌感

張絅伯

本月廿四日爲鄒韜奮先生逝世三週之期，韜奮出版社擬出專冊，以誌紀念，徵文於余。回憶民國廿一二年之間，與先生傾蓋論交，相見恨晚。維時先生正辦生活週刊，意在推動社會青年階層。商界從業人員，大中學校學生，幾無不人手一編。對於內政外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憂時憂國之心，實足當先知先覺而無愧。故雖小型刊物，而號召力之大，風行之廣，出乎意表。亦因之而遭當局妒忌，屢受嚴重打擊。余與先生往來甚頻，縱談國事，激昂慷慨，見於詞色。余性大質直，自九一八以還，鑒於日寇飛揚跋扈，氣燄方張，其少壯軍人，更形猖狂。一二八之役，余追隨當地人士，奔走呼號。時史君量才，黃君任之，組織地方維持會，接濟十九路軍。余亦於役其間，竭盡綿薄。厥後外患日亟，國事益不堪問。每相見，痛感言論出版，失去自由之苦。敵寇壓迫，變本加厲，余始終主張，余寧爲玉碎，毋爲瓦全，抗戰救國外，無他策。并在彼國貨幣雜誌中，對近衛文麿，尾崎行雄，馬場恆吾，室伏高信諸人發表意見，諄諄告誡，勿同種相殘，爲帝國主義之續。先

生深以吾言爲然。旋先生與沈公衡山，發起救國會，而有七君子之難。八一三之變，先生被釋，退往香港，輾轉在內地堅持抗日。余由北而南，遯跡海上，閉戶讀書，謝絕一切，從此天各一方。惟聞先生內地遍設生活書店，不斷供給青年精神食糧，發揚愛國意志，竟受當局取締沒收，無所不用其極。先生癌疾旣作，在滬就醫，終於不治。同處一城，緣慳一面，竟成永訣，悲哉！今距先生之逝，倏已三週，余則睽違，早逾十稔。緬懷風采，宛如在目，顧一轉念間，先生之墓，雖宿草已深，而其奮鬥精神，不辭險惡，不避艱危，與萬惡勢力相搏擊，至而死無悔，則長留人世，永不磨滅。先生固由癌而喪其生，然推其致死之由，人人知出於事業之受摧殘。所可以告慰於先生者，則生活書店，本先生未竟之志，在千辛萬苦中，繼續發揚光大，前途之未可限量，與夫貢獻於改良社會之功，亦豈可湮沒而勿彰耶。流光如矢，今距李公樸先生之遭無賴手鎗暗算，轉瞬週年，曾幾何時，七君子已去其二。獨衡老矍鑠逾恆，意志堅定，精神倍加，百折不撓。當前國家處於大時代之極度動盪中，現代化之新中國，正在誕生。其過程之必備嘗艱苦，吾輩身當其衝，責無旁貸，義不容辭，此則可告無罪於九泉者也。所尤可欣幸者，則先生昔日所指導之青年，其突飛猛晉，深入羣衆，效忠國家，有非始意之所及。目前各地學生運動所表現之新五四精神，則二十八年前之五四，可謂黯然無色，此次青年站在時代最前線，『反饑餓反內戰』，其口號是四萬萬人之口號，其呼聲

是四萬萬人之呼聲。鄙棄英雄主義，提倡服務精神，其組織之周密，紀律之嚴明，避免意氣用事，不作無謂犧牲，宜乎賢明教授，贊不絕口，心心相印，又得到羣衆之絕大同情。先生九泉有知，更可以瞑目矣。握管寫此文時，正是七七事變十週紀念。當日寇發動侵略，何嘗不一心一意，長驅直入，躊躇滿意。初不虞其結果之慘，竟至於此。豈知歷史重演，仍有人覆轍一蹈再蹈。際此後方經濟，瀕於崩潰，前線士氣，極度衰落，幻想美蘇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從夾縫中求出路。用盡種種挑撥離間手段，心勞日拙，皆成泡影。即至小限度之借款協助，軍火接濟，亦如畫餅充饑，可望而不可卽。雖或可如願以償，而遠水救不得近火，孟子曰，自作孽，不可活。不禁感慨系之。

假如韜奮還活着

千家駒

昨天接到通知，知道韜奮先生的三週年祭又快到了！時間過得眞快，韜奮先生逝世竟三個週年了！回想起他的音容，宛如韜奮還活着一樣。當然，韜奮先生的精神和事業是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所死的不過是他的軀體吧了！但在我的印象中，竟似韜奮這個人也沒死有一樣。記得當一九四一年春，國內吹起了一股政治逆流，一些不適於這股逆流的文化界朋友不期而會於香港，把香港當爲逆流的避風塘，韜奮先生即其中的一個，此外還有茅盾、友漁、長江、夏衍、仲華，亞子諸位先生。想不到在抗戰勝利之後，國內民主人士還是不得不把香港當成逋逃所，第二度流亡到這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來做亡命者。一九四七年的香港竟和一九四一年一模一樣，除了有幾位朋友已去了西北的大天地外，我們又在此不期而聚首，只有韜奮先生却永遠不能再見了。我想，假如韜奮先生還活着的話，他要不去到自由世界的天地，否則他一定也早到了香港，『大衆生活』一定早早恢復起來，他一定活躍於南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已成爲我們中國的一顆明星，遠遠地照耀着華南以至全中國的

無數百萬青年前進。他一定天天和我們在一起，領導着我們工作。他一定用那銳利而帶感情的筆鋒，無情地掃射着中國的反動派，使中國法西斯的妖魔無所遁形於天地之間。然而今天韜奮先生却已不在人世了，這不但是我們朋友們的損失，也是中國整個民主運動不可彌補的損失！

近幾年來，我們民主人士眞是損傷太重了！我剛剛提筆寫了一篇聞一多先生週年祭的文字，繼着又寫了韜奮先生逝世三週年的紀念文，此外還有行知先生去世也是我們最大最重的損失。他們雖然有的病死，有的遇害，但都是直接間接死於中國的獨裁政治手裏。行知先生懷念韜奮先生的詩上說：『火把千千萬，一熄千萬亮。』是的，韜奮公樸一多行知四位先生的軀體雖死，但無數千萬的韜奮公樸一多行知已經新生了，今年的新五四運動不是『一熄千萬亮』的明證嗎？中國的反動派已經掘好了自己的墳墓，子夜將過，黎明當不在遠了吧！

從韜奮兄想起

思　慕

韜奮兄在太平洋戰前撰著，連續刊載於香港華商報的「抗戰以來」，暴露抗戰的黑暗面，反人民的壞政府的眞面目，旣眞實而又潑刺，有强烈的正義感，是當時最吸引讀者的文字。現在，華商報復刊一年多了，但像「抗戰以來」那麽精彩的連載專欄，實不容易找到。

也許在當時還有人以爲「抗戰以來」那樣的暴露，未免過火一點。現在，在韜奮兄逝世兩年之後，只要我們讀讀政府的若干文告，我們便知道韜奮兄一點都沒有寫錯。對於反動派不存幻想，嫉惡如仇，這正是韜奮兄的眼光和意志的過人之處。

＊

韜奮兄是以辦通俗的「生活」週刊見長，這樣的刊物，雖然不是「絕後」，但在今天解放區以外的地區，還是鳳毛麟角。也許有人以爲辦通俗的刊物並不難，但做起來就確實不易。這需要豐富的常識，廣泛的趣味，向人民學習，替人民服務的熱烈精神和虛心。以香港來說，深入淺出，能爲

廣大讀者解答現實切身生活問題，趣味雋永的通俗刊物，非常需要，可惜還沒有像「生活」或「大衆生活」那樣的刊物出現。華商報的讀者版和副刊極力想做到通俗化，但仍離這目標很遠很遠。假如韜奮兄還活着而在香港，相信這種需要就可以滿足了。

*

韜奮兄忠於工作崗位的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他編刊物，就集中全力去編，由看稿子，編排到跑印刷所，看最後校樣，都盡可能躬親其事，不肯旁務。這已是許多朋友都知道的事。記得在武漢的時候，韜奮兄編「抗戰」三日刊，有時有人請他去演講，他却婉詞謝絕。因爲他不願在編雜誌外，再分神應付他認爲比較上不是他所長的事情。

韜奮兄留學過外國，著譯過關於國際問題的書，但他不以國際問題專家自居，遇有重大國際時事發生，他却誠摯地向常寫國際問題的朋友請益。不强不知以爲知，虛心學習，也是韜奮兄的長處。



II

他怎樣辦刊物，辦書店？

民國十年，韜奮初來中華職業教育社，就職編譯，兼中華職業學校英文教員，首先表現於羣衆中者，爲責任心之特別濃厚。吾腦海中所留着對於其初期作品之印象，文筆清朗流暢，工作敏捷刻實。而其教英文，自始採用直接教授法，督課極嚴，諸生皆畏之，而成績大佳，終皆敬而愛之，此爲前後六七年間，受其教者一般之輿論。

及其擔任生活週刊編輯，以其清朗流暢之筆姿，運以純一不二之精神，使讀者興趣，逐漸濃厚，銷數逐漸增進。生活週刊本以指導人生修養爲主要目標，在民國十五六年以後，青年受環境之影響，很自然地熱心政治，研究政治，口有談談政治，筆有寫寫政治，而生活週刊遂演變爲社會性青年政治讀物，讀者與編者之興趣，相伴而增高。其時韜奮之文章及其工作精神，已與讀者思潮凝合而爲一體了，始則青年歡迎之，繼而中年老年人亦歡迎之，與我年齡相若之朋友，莫不人手『生活』一編。吾嘗戲問君等乃亦中『生活毒』乎？皆答，祇覺『生活』痛快，吾所欲說者，都代我說出，祇覺非讀不可，最高峯達十五萬分時之景象如此。

有一事，足以證明『生活』在社會上的勢力，民二十一上海一二八抗日戰起，生活偕若干方面，各發起募集慰勞金，生活在最短時期，集款最多，其數量已不能記憶，祇記得一呼而集數十萬，此款都出自三元五元之羣衆，使一般爲之驚訝。

『生活』有此盛況。不惟其文章使然，蓋韜奮之工作精神，亦爲一般人所不能及。一、『生活』自始至終出版從未脫期，二、全部刊物每一個字無論輕重大小，皆經韜奮閱過；三、韜奮從不肯在生活以外，爲其他刊物寫文章。而其採集材料之勤，亦可舉其一二事。有某大官盛傳其有貪污行爲，韜奮四出調查，查得某項公共建築，與包工者訂約若干萬，同時，建築一私宅，窮極富麗，而訂約僅若干萬，將其數字一一披露。又上海各報，大都有冠蓋往來一欄，詳記某日某要人自京至滬，某日某要人自滬返京，『生活』爲之彙製一統計表，則某某要人一月間去上海幾次，半年間去上海幾次，一覽了然。其搜集材料之勤，大率類此，然其所揭發都與民生、政紀有關，從不涉個人陰私，以此精神寫此文章，轟轟烈烈中，廣大羣衆之信仰在此，而一般對『生活』之忌與恨亦即種此。

既而韜奮出國，而歸國，而從事寫作如故。

既而韜奮入獄，而出獄，而從事寫作如故。

——黃炎培

近代中國文化界，在新聞事業，出版事業上，最有成績，最有創造能力的，要算鄒韜奮。經驗告訴我們，如果為宣傳工作不是為一般營業的報紙，則一定是賠錢而且常常為反動勢力所摧殘。他深知這一切，因而在『九一八』後，一面以生活週刊來鼓吹抗日救國；一面創辦生活書店以作服務並步文化事業的中心，並藉以支持雜誌。因此在一九三三年末，週刊雖遭國民黨當局封閉後，尚能繼續創辦新生、大衆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抗戰三日刊，及全民抗戰。這些刊物雖屢遭當局封禁壓迫，而當其盛時發行至二十萬份以上，打破了報界的歷史紀錄。它們在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立及堅持團結抗戰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成績都是由於他實事求是，艱苦卓絕的精神創造了許多新的辦法所造成的。生活書店是一種合作社的組織，他在經濟上，不僅廉介不苟，而且事事清楚，有條不紊，深得大衆信任，創造了工作的好模範。生活書店出版的書籍極為廣大羣衆，特別是青年所歡迎。尤可貴的是他的羣衆觀點及為勞苦大衆服務的作風，他常常為羣衆指示解決生活問題，在刊物上特闢通訊欄以與羣衆通信，這是接近羣衆、深入羣衆的好方法。

——吳玉章

去年九月間，我曾經在一個青年雜誌上寫過一篇追悼韜奮先生的短文，裏面說到韜奮先生的文章，與辦『新民叢報』時代的梁任公先生相像，『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有一種極大的吸引力。這種力量，是從他對於自己的國家民族的熱愛產生出來的。他寫文章，說話，不像有許多人一樣，只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作一點客觀的說明或解釋就算數。他總是把自己整個的人格、精神、感情，融和滲透在他的文章和語言裏。他渴望他的讀者聽者相信他所說的是眞理，大家依照着他去做。這段話裏有『不僅有許多人樣只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一句話，我自己也正是『許多人』裏頭的一個。這些年來總常常感覺到有若干文章，寫作態度似乎太客觀，太冷靜，缺乏熱情和力量。無形中橫伸着一隻黑手，不容許大家暢暢快快地說當然是個主要原因，而就作者來說，自己愛國家，愛人民大衆的心夠不夠熱烈，夠不夠眞摯，自己的勇氣和毅力夠不夠充分，夠不夠堅強，都是需要省察的事。

——傅彬然

現在的青年不知道怎麼樣，若是抗戰以前的青年，大概很少沒有讀過他的文章的。說句老實話，他的文章，並不能以文字技巧見長，說他是文章家，完全是不對的；但是，無論誰總可以在他的文章裏看到了他的豐富的常識，和一個正義感的人格。從生活週刊起，我們不時的見到他暴露社會，同時也暴露他自己思想態度的文字。他初期的見解和他後來的思想有着很大的距離，也明顯的從他的作品裏表現出來，所以我們可以不過譽地說，他的文字是以他的人格來寫作的。

再嚴格地說，他不能算是思想家，也不是理論家。他最好的文章，也就是那些談最平常的道理的文章，一句話，他是『常識家』。然而不幸，——我們中國社會所最缺乏的，偏偏就是常識！常識在中國，反成爲最不平常的知識了，這是可悲的。但因此，也成就了韜奮先生的貢獻。若從這一方面說，他那一種通俗明白的文字，是很有社會教育的效果的。小言論和萍蹤寄語兩書，尤其滿足了都會市民的胃口。後來的文字稍爲政論化了，反而和一般市民發生了距離，失去舊有的魅力，這是從常識家轉到政論家的必然結果，當然不能說是他的文字失去光彩的緣故。

——趙超構

二十年來，先生不僅以進步的思想和勇敢的行動，感召了萬千讀者羣，且更以實事求是的精神，認真而周到地，幫助讀者們解決了許許多多在學習上在工作上，以至在日常生活上的疑難問題。記得在上海的時候，有一位蘇州青年許君，簡直把先生當作私人顧問，不論什麼問題，都要先生替他解答。同人們都感覺不勝其煩，但先生却每信必覆，循循善誘，從無半點倦意。抗戰開始後，那位地主出身的青年，終於在先生影響之下，毅然自動投入抗戰的洪流，成為一員反法西斯的戰士。這只是許多例子當中的一個。受先生思想行動薰陶和感召而堅決地參加抗戰民主陣營的，不知有多少青年。本店（生活書店）曾刊行『信箱外集』五册，就都是讀者函詢而經先生解答的疑難問題，總計不下百萬言，這種為大衆服務的生活態度，實感人至深。

大約三個月之前，我們就聽到先生病重的消息，據說先生的病，每天要發作幾次，每當發作的時候，要痛得滿床亂滾。這使我們感覺非常痛苦。但先生在病稍痊，痛稍減的時候，還是伏枕寫作，奮筆疾書，寫自傳，撰遺囑，並為文為國內民主團結而呼籲。也許是先生自知病情的嚴重吧，因此先生對於勸他稍稍休息的友人，總答以『能寫多少是多少，寫一些是一些』，這是先生至死不渝的奮鬥精神。

本店（生活書店）的業務由簡單的代辦部發展到龐大複雜的組織，是很艱苦的一個發展過程。先

生歐遊回國，首先倡導採行民主集中制，什麼事情都是大家公開商討，談的時候，開誠布公地談，決定以後，就交負責人去做，使得全店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每一個人都有充分發揮特長的機會，把同人的工作熱情，提高到最大的限度。其間，先生曾記錄實踐經驗，陸續寫就『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一書問世。抗戰初期，本店迅速發展到四十二個分支店，所有派出去的負責人，儘管水準不一，但對工作的堅苦耐勞，對本店事業的忠誠努力，則完全是一致的。這是本店的一貫作風，也就是先生所倡導的工作作風。

先生主持各種週刊期刊，先後八種，爲時歷二十年，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每期一定按時出版，從不脫期。先生身爲本店總經理，上辦公室絕對嚴守工作時間，如因故稍遲，亦必事先通知；同人如犯錯誤，先生對之，嚴加責備，決不姑息；但一經糾正，則溫語慰勉，決不苛求。這些都是表示先生的處事不苟。

同人間有一時爲逆境所挫，精疲氣餒者，先生輒加以勸勉：『本店從呱呱墮地的時候起，就一直在艱苦困難中進展着，我們應該以堅決的意志和鎭定的心情，在艱苦困難中奮鬥，我們深信我們所努力的文化事業，對於整個中華民族是有着重要的貢獻，値得我們含辛茹苦而無所怨尤的。』本店能夠渡過一重重驚濤駭浪的難關，完全是先生奮鬥精神貫注的結果。環境越困難，辦事愈麻煩，先生更沉

精地指出：「我們爲共同努力的集體事業，就是受盡麻煩，也應該用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來對付。」現在先生是以身作則地實踐了這句話了。

——渝文

他和人民大衆在一起

熱愛人民，眞誠地爲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毛澤東

*

韜奮先生的精神是今天我們正需要的精神，它包含着實際主義的工作作風和爲大衆服務的高度熱情兩個成份。這種精神引導他，能在近二十年中國最激烈的民主革命鬥爭中，創造了堅固的陣地，鍛鍊出那樣堅強的人民大衆的立場，爲人民、對人民負責的精神，爭取工作、永不退却的頑强性，無限的熱情與不知疲倦的工作態度。這使他在革命的出版業、新聞事業，放出異彩，使他成爲一時代知識青年的導師，成爲中國知識份子的方向。這種精神在今天是極可貴的。我們今天要接受他的，正是這

份中國稀有的遺產。

（一）創造陣地、堅持崗位

韜奮先生因爲是個實際主義者，在他走進社會鬥爭中，首先是爭取陣地，創造陣地。他知道，如果自己沒有取得一定的陣地，自己不會站穩腳，是不能和敵人長期鬥爭的。從『生活週刊』出發，他找到了他的崗位，開始創造自己的陣地，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經營生活書店。由『一個小小過街樓』，發展到全國總支店五十餘處。自然這不僅是他一人之力，他自己說，這是因爲讀者和作家和他合作，書店工作人員辛勞血汗，是一種集體創造，但他是唯一的組織者，主帥。除開他自己常常稱道的，他左右那支『小小的軍隊』外，政府是不會給他幫助的；反之，給他的是壓迫。其他個人是不會贊助他的，他也從未作此打算。韜奮先生能夠堅持輿論的崗位至二十年，書店是他的基礎。『生活週刊』停刊，『新生』出世；『新生』查禁，『大衆生活』出現了；『大衆生活』遭難，『永生』又生（新生、永生二刊，名義上非他主編，實際一脈相承）；『永生』雖未永生，『生活日報』發刊；日報日停，『生活星期刊』繼出；『生活星期刊』短命，八一三的砲火，又打出了『抵抗』（又名抗戰三日刊），發展而爲『全民抗戰』。及至『全民抗戰』被擊破，雖出走香港，又復打出『大衆生活』

之旗。這一方面，雖然說明他如何堅持崗位，令人欽敬，但亦說明他有雄厚的力量，有遠見。他那樣辛勤爲書店工作，是有遠大的眼光的。這種實際精神，不是短視的人所能看到的。

生活書店不僅是他個人政治鬥爭、文化鬥爭的物質基礎，也同時是抗戰前期中國革命文化運動的物質基礎（雖然不是唯一的）。生活書店成了一切前進出版、發行的中心。生活書店出版進步刊物，實際上當時在全國雜誌界居於領導地位。通過這些刊物，團結了作家、讀者，起了偉大的宣傳組織作用，維持住很多前進作家簡單的物質生活（賣稿生活）。使他們能在反『文化圍剿』中頑強的作戰。它變成和革命不可分離的一部份。

不僅如此，在救國運動中，生活書店直接起了支柱的作用。韜奮先生參加救國會運動，是帶着他那支『小小軍隊』的。救國會運動，主要是靠宣傳、號召，這又不得不歸功韜奮先生他爲大家所創造的這種優良條件。

（二）爲羣衆、對羣衆負責

韜奮先生創造陣地，是爲的服務於廣大羣衆。這自然經過了一定的發展過程。在他編『生活週刊』之初，那服務的對象還是一個狹小的圈子（職業修養指導），但實際生活中的矛盾，由千萬讀者

反映到這位青年編者的眼前，使他突破那狹小範圍，一步步接近廣大的羣衆。

他的崗位是雜誌編者，服務的對象首先是讀者。他主編的刊物，其中最大發行額達二十萬（『生活週刊』、『大衆生活』），他前後擁有百萬讀者，他和讀者的關係之密切爲其他刊物所未有。他的刊物，素以讀者通訊爲特色。『大衆生活』時代，有一月收到讀者來信達一萬件，平均起來，他每日能收到讀者來信一百封，他是如何處理這龐大的工作呢？他說：『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個半天來看信』，『有五、六個同事全天爲着信件事幫我的忙，還有時來不及。』然而，他感到『這是一件極有興味的工作』，要『用全副精神答覆』，是『一種責任』，不答覆是『無理由』，他工作到『深夜還捨不得走』。編輯部的收發信件，有一隻卡片箱，好像一個小圖書館一樣，那裏藏有廣大讀者的通訊處。生活書店發行網之寬，事業成功的祕密，就是韜奮先生在十餘年中有了這樣的卡片箱，他是以這種工作爲『無上榮幸』的。

他這樣艱辛的創造，對於自己的事業是應該視同自己的生命的；不錯，他愛護他的事業重於自己的生命，但一旦受到『黑暗勢力』的壓迫，逼迫他改變立場時，他可以馬上無保留的表示，寧讓事業滅亡，不能離開羣衆，背叛羣衆。他一生有三個大關鍵，表示了他『忠肝義膽』（對羣衆），就是『生活週刊』時代，他被壓迫出國，沒有妥協；『七君子案』，他未妥協；三九年四〇年初，國民黨

封閉全國生活書店，只剩重慶一處，並壓迫生活書店應和正中等官家書店合併，壓迫他加入國民黨，他毅然拒絕，憤然辭去參政會那虛僞的議席，表示抗議，離開祖國。這些事都係大家所共知，用不着詳說。然而，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所能辦到的。他那種『爲大衆謀福利』，和大衆融成一片，替大衆負責的精神，眞是令人感動！

(三)爭取工作、永不退却

韜奮先生的實際精神還表現在任何環境堅持工作和爭取工作上；抗戰初期，他將生活書店多年的蓄積，全部用之擴大業務，東扯西拉，發展事業及刊物。同時，他出席各種會議。參加參議會後，從不放過發言的機會，也不作過高的幻想，他曾經說過：『別人請客，我是把自己當作主人的。』參政會上他是一個雄辯家，一個被頑固份子認爲『最可怕的人物』。三九年以後，環境變得更壞了，發言的限度，幾被剝奪淨盡了。『全民抗戰』是不易維持的。記得三九年下半年，每期二萬八千字，常被審查老爺們抽掉大半，社論有時更寫至三次，有時從審查處跑回來氣得臉皮發青，但從未說過『不幹了』。他始終堅持『全民抗戰』的存在，永不『自動撤退陣地』，因爲敵人正是希望我們不戰而退的，『全抗』一直由他堅持到他不能不離開重慶。

（四）熱情、不知疲倦的工作

熱情、天眞、可接近的朋友，這是凡見過他面的人一致稱道的。他對工作，對羣衆服務，那樣大的熱情，上面已略提過了。他對人，那樣天眞坦白，不少和他接近過的人，都曾體驗到。這裏我想說一個故事：在三八年，我們從漢口遷到重慶，因爲『全民抗戰』還是三日刊，遷川期中，要保證不停一期，那就不得不坐飛機。我們帶了大批稿子，讀者來信，跑到機場，我們最擔心的是檢查，到了機場，馬上有兩位憲兵來找我們，向我們敬禮，說是我們的讀者。韜奮先生初不相信，以爲是假的。這兩位憲兵看見我們冷淡，有一位一面請我們喝汽水，一面流下淚來，說：你們不要懷疑我們是壞人，我們是大夏學生，永遠跟你韜奮先生走的。韜奮先生當時改變了態度，馬上含淚和他們握手，安慰他們，向他們道歉，如像對最親近的朋友一般，天眞的問道：你們是否接到我們走的報告？那位青年面上發赤，說他們奉到上級指示，在我們買到機票的第二天，他們正在擔心不知誰那天値日，想不到今天我們就走（提前了三天），剛剛輪到他們，所以可以少了檢查的麻煩。後來我們平安的上了飛機，在飛機上，韜奮先生興奮的手舞足蹈，說：『我們的辛苦不白費，到處有我們的人。』並說，中國革命一定勝利，只要看這一代青年的心就可保證，其對人熱情如此。

至於他一生不知疲倦的工作，那有他一生事業可證，這裏就不多述了。

這就是韜奮先生的精神，雖然我這裏說出的只是這一點，就是這一點，也足以說明那是如何稀少可貴的精神啊！韜奮先生一生腳踏實地，一步步走向眞理，爲中國人民大衆服務二十年，雖然他最接近的還是中國知識靑年，一小部份工人，未能更廣大的做到爲工農兵服務，這是受了政治條件的限制，不足爲先生病。

中國知識靑年要不做空頭革命家，要放下知識份子的臭架子，面向羣衆，那你就得學習韜奮先生的精神，你才能和羣衆結合，更好的爲大衆服務。

韜奮先生精神不死！

——柳湜

＊

鄒先生是我們看着成長起來的一位人物，他出身平凡至極，可是在近一二十年的奮鬥中，他已遺下了不少値得我們禮敬的成就。

蓋棺論定，一個人常常只能在死後才能得到一個公道的論評。對於一個死者，因距離的擴大，感

情上與理智上的蔽障已儘量消除，這時我們才能由責備求全與吹毛求疵，一變而爲客觀的欣賞與悼惜的。對一個死者我們要放棄一切成見，而後才能給他以最大的公道。

鄒先生是從『羣衆人』（Mass man）裏面成長起來的。他那隻最通俗的筆儘管你說他如何膚淺，可是他說出了人民懂得的話，他叫出了許多膚淺的人民之聲，他最能欣賞人民的價值。多少青年曾被他那枝筆帶着往東西奔赴，而這些青年是我們這些高級知識份子所輕視爲『羣衆人』的；他辦的刊物曾教育着無數的沒有受較多教育機會的職業者。他的努力因爲最後是要求一個政治上的改革，所以始終是生活在威脅與苦難中。他也是一個讀書人，但沒有接受中國士大夫的傳統，他帶着一種新的氣質在文化上與政治上作忠實的努力。對這樣一個人我們要給以公道才對。

我們要承認：作爲領導階層的知識份子，今天在各人的骨子裏血液中仍充滿着傳統士大夫氣質，無論說話與行動，始終是前後盤思着『榮譽、快樂、安全』（honor, happy, safe）三個條件。如其中一旦稍有所失，就像天塌了下來一樣弄到神智不定；因此，我們儘管懷有正義感，儘管對事有精透的認識，可是我們永遠是站在行動的邊緣上，更進一步的也只是淺嘗而止。

因爲有前種態度，我們的嗜好胃口多少都硬化了，我們始終不大能欣賞忠實人民的價值，我們始終不大尊重『普通人』的地位，生活態度文章與說話是越接近『高貴』『高級』的標準才越愜意。我

們樸實可愛的農民，在最前線與敵人格殺的兵士，在前後方維持日用品供應的謹慎的勞工與商店人員們的感情與地位，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考慮與尊重。在意識上儘管自認爲與這些普通人距離很近，但在行動上倒是與那些不應得到尊重的人距離最近。

在這樣一個苦難的時代裏，在這末一個坎坷的局面中，你我自己且計算一下：

我們說了多少沉痛的話，

我們寫過了多少熱烈有力的文章，

可是今天面對着這樣一個驚心動魄的局面，我們竟永遠是停留在行動的邊緣！

朋友，你我改悔了罷！

——適之（昆明·自由論壇）

他怎樣爲羣衆服務?

先生實事求是和爲羣衆服務的優良作風，在辦生活週刊上，更充分地表現了出來。他接辦該刊時（一九二六年十月），每期只印二千八百份左右，主要是贈送人。他接辦後，便聚精會神的工作。一方面，革新內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每期『小言論』雖僅數百字，卻是他『每週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他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爲最該談幾句話的事情』，發表他的意見。對於選擇文稿，極爲嚴格，不講情面，不顧恩怨。『不管是老前輩的或是幼後輩的，不管是名人來的或是「無名英雄」來的』，只須是好的他都用，不好的他『也不顧一切不用』。對於文字，認眞修改，他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爲他所不懂的或爲他所覺得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每期校樣要看三次，有的時候，簡直不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編排形式也『極力「獨出心裁」，不願模仿別人已有的成例。……往往因爲已用的形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盡心力，想出更新穎的形式來』。另一方面，增設信箱一欄，討論讀者提出的問題，並爲讀者服務，代購一切東西。讀者來信的內容，

都是一些現實問題：求學問題、家庭問題、婚姻問題、戀愛問題、職業問題，形形色色，無所不有。先生對於廣大讀者的這些來信，都盡力答復，他『把讀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與讀者的悲歡離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答覆的熱情，不遜於寫情書，一點不肯馬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些來信，有一小部分在週刊上公開發表和解答；大部分雖不能發表，先生也用『全副精神答覆；直接寄去的答覆，最長的也有達數千字的』。那時先生每年所接到讀者的來信，總在兩三萬封以上，覆信都存有底稿；來信者姓名和地址，都編入卡片，以便經常保持聯系。起初是先生自己拆信，自己覆信；後來最忙時，先生忙不過來，有四位同事專門擔任拆信和覆信的事，但先生一一看過，親筆簽名。因爲竭誠幫助讀者，獲得讀者信任，所以國內外讀者，就時常寄錢來託生活週刊社代買書報、買東西、買鞋子、買衣料，先生及其同事都盡心力做去，『不怕麻煩，不避辛苦，誠心懇意地服務』；有時買不十分對，還要包換。

由於先生的認眞負責，由於內容的革新和爲讀者熱烈服務，『生活週刊』不到三年，每期銷數便由兩千多份而增至四萬份；自一九二九年十月起，該刊又加以擴充，改爲本子形式（原爲一單張半），內容更見充實，每期銷數突增至八萬份，隨即增至十二萬份，後來更增至十五萬份以上，爲中國雜誌界開一新紀元！爲讀者服務一事，亦因後來愈來愈多，乃於一九三〇年成立『書報代辦部』，專辦此

事。這個『書報代辦部』逐漸發展，就成爲後來在全國有分支店和辦事處五十六處及爲廣大讀者所熱烈擁護的生活書店。

——張仲實

我的導師，韜奮先生，九一八事變前後，我已是『生活週刊』的熱烈的小讀者。你爲國難呼籲團結禦侮的文章，給青年們解決許多切身疑難問題的讀者信箱，都引起我小小的心向着你。國難日深，我的不能解決的問題也來了，你啓導我的民族思想意識，教我就學就業，指示我的人生道路，我的心靈由傾向而服膺着你。我是生長在商業傳家的家庭，沒有你指導以前，我童年的腦子裏灌輸的是商人汁液，希望將來長成爲富商大賈，到海外去同父親一塊發大洋財，過闊綽日子，國家民族存亡的意識與我是毫不相干的。但是看見你不顧一切，爲國事奔走呼號，與社會黑暗勢力做無情的鬥爭，指示青年們走的方向，你召喚我，將我改造過來，這是你的力量，這是你的偉大人格的造化。我終生尊敬你，感激你，我的自傳上說，你是我的最好的導師。你教我就學，很實際地按我的家庭環境，幫助解決我的就學問題。我的父親的不化腦筋，死硬要我與他習商，不讓我讀書，他的見解是讀書毫無用

處，我要讀書，他不供學費，沒辦法。但你對我表以惋惜外，說是家庭既沒有其他顧慮，讀書學費可以自想辦法籌措，教我去當小學教師，以所得做預備升學金。我得你的參謀意見，通過苦學的灣路，得進瓊海中學當工讀生，償了我的求學志願，這是你給我的指示。你再教我就業，個人的事業，要爲大衆事業着想，以大衆利益爲依歸。你這些話，時時勉勵着我，我曾把你因『愛國有罪』在上海被捕入獄，解放後，回答人家詢問的話貼在我的案前：『有人問我在獄中有何感覺，我常感覺到只是自己的渺小，大衆的偉大。』

——鍾懷瓊

＊

他不但在文字上細心教育青年，而且給青年許多實際幫助。只要你寫信去對上海方面有所詢問，只要你託他在上海給你辦一件什麼事情，他一定給你負責到底。記得有一次從上海寄來一份『荒漠』（文藝性質的半月刊）創刊號到我們『新我學術社』來，封皮上還打有『請交換請訂閱』幾個字。當時我們未出刊物，無從交換，我便將地址寫給韜奮先生請他代訂。他回信說：『我親自給你去了一次，該刊物出了一期，已經人去樓空，杳無蹤影。』反正，你只要給他去信，他一定給你回信，決不

落空，而且很快。不記得是那一年了，河津地面猛然流傳着一種『幸福之連索』（接到之後，要抄傳給自己的親友十人，如若不傳，家敗人亡）。我們就寫信問他：他的回信說：『這個連索，上海也有，上期「生活」上我曾談及，諒已看到。』——事實是這樣，我的信剛發出不久，那期『生活』就郵寄到了。但他接信之後，還要回信給你。韜奮先生對於他的讀者，那怕是一件很細小的事情，只要請託於他，都一定認眞幫忙。

——墨遺萍

他有堅定眞誠的政治立場

在韜奮和重遠中間，有幾個共通點。他們本來都不是從事政治工作的人。韜奮最初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教課，後來負責『生活週刊』的編輯，做的是一般性的教育文化工作；重遠在東北辦實業，他初到上海時也是爲了發展國貨工業。然而，九一八以後的國難危機驚醒着他們：在民族的大難當頭的時候，單純的從事文化教育工作，單純的要求發展民族工業，是沒有辦法的。他們兩人同有着奔放的熱情，不考慮個人的利害，而只知道什麼是民族的利益，什麼是大衆的利益。凡是屬於後兩者的，他們兩人都會不顧一切的去做。

韜奮爲了堅持『生活週刊』的主張而流亡國外，爲了救國運動而繫身。重遠擱起了他本行的磁業而創辦『新生週刊』，因爲『開罪』敵人的『天皇』而遭受政府的拘禁；抗戰爆發後，他奔走南北，不惜萬里跋涉，去新疆發動抗戰的力量，結果竟因此犧牲了他的生命。他們兩位的犧牲一切，從事救國運動，是一樣的，而不幸他們的遭遇也是一樣的。

當然，這些不應該是獻身救國運動者應有的遭遇。從他們兩位的遭遇，我們應知道從我們民族危機加深到我們民族解放鬥爭展開中每一個愛國志士所經歷的困難。

我和韜奮與重遠的相見，實際上不是很早的事。那是在抗戰爆發前兩年，韜奮初從美國回來，重遠剛剛從漕河涇監獄移到虹橋療養院的時候。但那兩年正是民族運動救亡運動洶湧澎湃的時運；在抗戰力量與妥協力量鬥爭的中間，在進步潮流與倒退潮流碰擊的中間，我最親切地認識到韜奮所發揮的力量。

他回國後創辦『大衆生活』。銷數一下達到了十五萬份，這顯示着文化運動和抗戰潮流配合起來的一個最尖端的表現。他去香港創辦『生活日報』，第一次衝破了這個殖民地孤島的沉寂。堆在他案頭的讀者來信，每天有幾百封——從極北長城外的義勇軍隊伍裏到極南的馬來亞荷印的華僑中間，都有着熱烈的讀者，不斷地把他們的呼聲傳給他。而韜奮，雖然有着許多實際的救國工作需要他去參與，他從來不讓這些來信積壓起來；有五六個人幫助他回答一切的回信，把必須透露的呼聲都發表出來。在中國的言論界中，他是眞正傳達着『人民的呼聲』的一個。

許多人以爲這樣一個救國工作者一定是最謹嚴而不容易親近的。事實上恰恰相反。每一個和韜奮談過話的人，都感到他的熱情和可親，他總是打開了心胸和人談話，使人感到他的眞誠和坦白。他一

直顯得很年輕，在他後來出走到香港時，才顯出幾年間的政治沉悶和苦鬥所給與他的一點蒼老。他在香港淪陷後流亡中所染到的惡疾，也許正是趁着他這一點疲困中潛入的。

——金仲華

＊

他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富於正義感，正派人物，他的爲民族解放及人民解放事業是忠心耿耿的，別無企圖的。他並不像有些人一樣，拿着抗日救國作爲陞官之道，當着統治階級給予他一官半職時，他就把民族解放事業及其過去一同奮鬥的朋友丟在一邊，其實這種一官半職也不過是統治階級的釣餌，曇花一現而已。韜奮先生的爲人，與這種人是完全兩樣的，他不爲官爵所動，不爲威武所屈。我記得一九三八年在武漢時，當時國民黨用一切力量勸他加入國民黨，以官爵誘他，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誘他，他始終堅決拒絕了。而當皖南事變正是危機的時候，他憤然辭去了國民參政員，仗義執言，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我也記得在一九三九——四〇年時國民黨當局以威力脅迫生活書店總店時，他並沒有屈服，也沒有接受國民黨當局的任何一個條件。

他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富於事業心，用盡一切心血把他自己辦的事業——文化出版事業，發展和維

持下去。他用新的辦法——合作社辦法來經理他的書店，因爲他的書店既沒有銀行資本家的經濟支持，也沒有個人或團體的經濟支持。完全靠書店營業的盈餘來發展業務。國民黨經常造謠說共產黨津貼生活書店，其實生活書店業務的發展與共產黨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韜奮先生及其同事的努力而達到的。正因爲韜奮先生忠於自己的業務，總想擴大自己的事業，生活書店的稿費比國民黨官辦書店的稿費要低，因此也有不少的作家，許多是左翼的作家，對生活書店的稿費不滿。我還記得有某幾個作家從戰地參觀回來寫了幾部稿子，因生活書店稿費低，而將原先談好交生活書店出版的稿子，又要回去給國民黨書店文化服務社。但是國民黨書店雖給了高價的稿費，書還是沒有出版。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韜奮先生所辦的書店是在經濟困難，政治壓迫的條件下，始終不灰心的，把自己的事業貫徹到底。

他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富於青年氣，朝氣勃勃。他的作品是這樣，他的講演談話也是這樣。可以說在現代中國的男女青年中享有很大的威望的，韜奮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給予中國青年思想上很大的幫助，給予他們求學就業以及社會活動的各方面以指導。

——凱豐

初見韜奮先生總覺得他不過三十多歲，不但他的容貌使你有此感覺，他的言談舉止都表示他絕對不是飽經憂患的五十左右的人了。和他相處稍久，你便會覺得估量他有三十多歲也還太多，實在他好像只有二十來歲。比現在有些二十多歲的年青人更爲『年青些』的一個中年以上的人。

有許多的二十來歲的年青人在言談舉止方面當然也有韜奮先生那種活潑和熱情，至於容貌，不用說，自然會比不見老的韜奮先生更爲『後生』，然而，恐怕未必能有韜奮先生那樣的天眞！對人的親切，熱情，對事的認眞，踏實，想到任何應該辦的事便馬上想辦，既辦以後便用全付精神以求辦得快，辦得好；想到人世間一切的黑暗和罪惡便憤激得坐立不定；看到了卑劣無恥殘暴而又慣於說謊的小人，滿嘴漂亮話而心事不堪一問的僞善者，便覺得難與共戴一天——這些都是韜奮先生的永遠令人敬仰之處，然而，我以爲最可愛者仍是他那一點始終保持着的天眞！

不計利害，不計成敗，只知是與非，正與邪，有這樣操守的人固不獨韜奮一人；然而像韜奮那樣一以天眞出之，就我的寡陋的見聞而言，尚未見有第二人。對於畏首畏尾的朋友，他有時會當面不客氣地批評，這是他的天眞。辦一件事，有時會顯得過於操切，這也是他的天眞。爲了忘記疲勞，會在

噱頭主義的歌舞影片之前消磨數十分鐘而盡情大笑，這同樣也是他的天眞！或者有人以爲這是他的盛德之玷，可是我覺得這正是他的可愛之處。我們現在太多了一些人情世故圓熟得像一個『太平宰相』似的年青人。

由此可以想像到：要他在一個惡濁的社會中裝聾作啞，會比要了他的生命還難過。他需要自由空氣，要痛快的笑，痛快的哭，痛快的做事，痛快的說話。他這樣做了，直到躺下，像馬革裹尸的戰士。雖然已經抱病，他奔赴他的崗位，貢獻了他的力量，以至於生命。

——茅盾

*

當我想起韜奮先生時，我所想到的，並不是他所說過的某一句話，他所做過的某一件事，而是他的整個人格，他好像還是生氣勃勃，精神飽滿，帶着他的全副人格站在我們的中間。

也許有人不喜歡用人格這兩個字。的確，一方面，庸俗的腐儒在人格這兩個字上造成了對於人們冷冰冰的，惹厭的印象；而另一方面，在這社會中有着不少的市儈主義者，他們見利忘義，無所不可，無所不爲，以爲這就是做人的道理，而把一個人根據着一定的原則堅定不移地在全部生活中保持一

個完整的人格這樣的事，看做是可笑，甚至可恥的事。

我所謂人格，並不是腐儒所給加上的任何意思，而正是市儈主義者們所認爲可笑可恥的那種品格。

『有所爲，有所不爲』是標識出一個獨立的人格的特徵。但人們可以根據這一個標準，也可以根據那一個標準，來決定他的『爲』與『不爲』。所根據的標準是千萬人所贊同的標準，那才值得爲千萬人敬仰。把千萬人共同的標準，融化在自己的精神內部，不是自己勉强來遵奉這標準，而是心甘情願地用自己的血肉來供奉給它：是應該做的，就非如此做不可，不應該做的，無論怎樣也不做。這就形成了最堅貞不拔的戰鬥的人格。—韜奮先生的就是這樣的人格。民主的原則貫澈着他的全人格。他的一言一行，他做什麼，他不做什麼，一切都從這原則出發，或者說，自然都符合這原則。他自己沒有一點動搖，也沒有人能夠對他有一點懷疑。假如我們說，民主已經成了他的性格，是決不誇張的。

翻開韜奮先生的遺著來讀，也許有人說，這裏並沒有什麼豐美的詞藻，傑出的主張。但是假如只是講做文章，那麼做文章豈不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麼？運用華麗的詞藻，提出動聽的主張，這是連殺人犯也可以學會的。但韜奮先生的文章，斷然有異於一切只是做文章的人的文章。他所曾說過的有些話，過一個時期看，也許覺得很平常，但在當時當地，倘沒有對所是與所非抱着最堅强的信念，是不

[illegible]說，不能說的；而假如不是他的全人格燃燒在他的文字中間，也不會給千萬人以那樣深的感染的。

寫文章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而拿與千萬人共呼吸的堅貞的人格鎔鑄成的文字，却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了。

言行不一致，對於韜奮先生，簡直是不可能想像的事。也許有人覺得，韜奮先生一生並沒有成就什麼偉大的事業，但是還有什麼事業比對千萬人民有益的事情更偉大的呢？至今，無數人還在懷念着韜奮先生的書店和刊物，那正是他一生精力所從事的事業，在這事業中貫徹着的也正是民主的原則。他雖然把書店和刊物當做他的事業的中心，但他不能爲事業而犧牲他的原則。在受摧殘時，他也決不在民主原則上有一點讓步，來求他的事業的苟全。在這時，他是苦痛的，然而他是心安理得的，因爲他無愧於他自己的人格。同樣的，在直接的政治活動上，也是如此。他在參政會中，曾爲促進民主團結而作最大的努力，但當他發現參政會已不能起任何有益的作用時，他毫不猶疑地丟開它，像丟開一隻穿透了的破襪子一樣。

就是以這樣的光輝的人格，他永遠照耀着我們。

——胡繩

他有實際認眞的工作精神

他在年青時從學校所獲得的知識只是國文、英文、數學等求學的基本工具，社會知識是缺乏的。畢業後服務社會，第一次是任紗布交易所英文祕書，繼而到申報館也是英文廣告和書信的翻譯，到時事新報只是做行政工作而非記者。在這些瑣屑的無興趣的事務工作中，他十分盡職，因而養成了細針密縷的工作作風，驚人的實際精神。民國十八年他辦『生活週刊』，讀者來信一年到兩萬多封之多，都予以適當的回答。他對羣衆來信的指導，大的方面從抗戰救國以至社會制度問題，小的方面廣泛到求學問題、職業問題、婚姻問題、社交問題、工作方法問題、文字技術問題，都具體的個別的加以解答。這就是他有驚人的實際精神的明證。他關心羣衆每一個小問題，例如他辦的書報代辦所，目的是代辦書報，由於書報代辦建立了信用，於是擴大到代辦一切，竟至有人請求代找律師。他的『生活週刊』，由指導一般的羣衆生活竟擴大到個別的書信指導。他這種驚人的愛護羣衆的熱忱，必須先具有他那樣驚人的實際精神和驚人的細針密縷的工作方式，才能達到。他在一年中收到讀者兩萬多封信，

實反映的社會情況和政治情況給他以最豐富的具體材料，經過分析和綜合就成了他指導羣衆的資本或科學。他於是成了羣衆的導師，同時又成了羣衆的學生。羣衆給他每一封信都成了他自己的社會科學和政治科學的片段，所以他的學問是羣衆化的學問。

他是一個熱心的政治家。但他也善於經商，他的生活書店沒有政府的津貼、資本家的幫助以及人民的捐款。該書店是一個典型的革命的合作經濟，其基本的辦法都是他所手訂（見『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且在營業中給工作人員以適當的學習機會。他所有以上一切新的方法和方式仍然是從羣衆中學習來，再用到羣衆中去。他那種無微不到的工作方法，仍然不是手工業的一手包辦，而是精密的分工。所有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反攻過程中使用新式技術時所需要的，也是不久將來甚至目前的建設所需要的。我希望把他的著作擇要整理，以作幹部文化讀本。

他那種無微不至的作風，並沒有妨礙他對於政治中心的抓住，因爲他關心的瑣屑問題正是羣衆生活上的嚴重問題，不是資本家所希望的五分錢的額外利潤。他無微不至的精神，並不是放在小問題上面。國民黨企圖收買生活書店，出錢出人，不計還價。他就準備犧牲整個生活書店，讓國民黨的武裝來封閉，不在政治上屈服。在這種條件下，他寧可犧牲整個書店而保持政治立場，他是爲革命而建設事業，也就可以爲革命而犧牲。他的瑣屑處，同時也就是他的偉大處，我認爲他具有革命精神和實際

精神兩方面。

——徐特立

像我這一代的人大概都受過『生活』時代（包括自『生活週刊』至『生活日報』）的教育。『生活週刊』最初目的，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不過只打算辦成一種『職業指導』的讀物，韜奮則把它辦得提高到青年『思想指導』的讀物，因此，獲得廣大的知識青年以及一部份工人讀者的擁護。刊物剛辦的時候，人力和財力都很有限，每一期從編輯、到校對、到發行都是他親自和兩個工友一手辦到底，還要經常出外招攬廣告。由於外稿很少，刊物的內容便要他一個人獨自來承當。所以那時候看到的『因公』、『心水』、『落霞』等等署名的文章，其實都是他一個人不同的幾個筆名。雖則如此，但刊物從未脫期、誤期，校對也很精細，版面新穎活潑，在當時是夠算獨出僅有的，而內容還非常充實，非常生動，很能適應讀者的需要。這樣的艱苦情況經過一年多，才增加了一個助手，但刊物擴大了一倍（由兩版增到四版），以後還增加了書刊。抗戰後在香港辦生活日報時的情況也和這差不多，就在一間小樓房裏面辦完一張日報出版前後整個過程的每一個工作，不過那時人手較多幾個而已。

生活書店的發展情況和這差不多。最初的生活書店在辣斐德路一所一樓一底的小房子裏，樓上是『生活週刊』的編輯部，樓下事實上就只是『生活週刊』的一個發行部，因爲除了該週刊的幾期合訂本和幾本叢書而外，滿架滿屋堆的都是『生活週刊』。後來逐漸代售一些別的書籍，後來逐漸才自己出書，到抗戰以後竟然擴展到四十七個分支店，成了全國僅有的一個後進的大書店。

韜奮事業的特點，我和他自己研究過，不外以下這幾點：第一、他實事求是，他從來沒有過一開始就來一個什麼『大計劃』，所以他所創辦的事業都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根據一定的對象一定的需要來擴大他的計劃，所以他的事業不致落空，都能夠辦得很出色，很成功。第二、他富有羣衆觀念，他的文章之爲廣大讀者所喜愛，是因爲形式上流利明快，短小精悍，而內容則務求充實和生動，並且都能抓住當時環境的特點，如『九一八』以後的『生活週刊』，全部重心都放在『國難』問題上；『大衆生活』的全部重心都放在當時的『一二八』運動上。他辦的刊物不但做到及時反映羣衆的意見，還能做到去組織羣衆，如『讀者信箱』、『讀者顧問』、『讀者小組』等等，對於以後救國會運動深厚的羣衆基礎起着準備作用。他的生活書店是合作社性質的，吸收資金是採取小股多股制的辦法（店員都參加股東），按期開會，選舉領導，按期分紅，還有很多的社會服務。第三、他的工作方法、工作制度都非常科學，所以能用少數人力財力完成艱巨的工作任務。『選能任才』，使得大

求都勝任愉快。制度嚴格而又靈活，所以人力財力都沒有浪費的。工作重質量，數量只在一定的需要上去擴充。一切都有計劃、有準備、確實、精細。

但這一切都是與他的民主主義的進步思想相結合的，所以他才能不辭艱苦的去幹，所以才能堅持並發展了他的事業。

—— 鄒恩洵

我和韜奮兄在蘇州共同坐牢以前，雖然神交已久，但實際上相識和接近，還是在我參加救國運動以後。至於在蘇州的一個階段，那末一天二十四小時，簡直無時無刻不在一起，因此對於他的思想行動，生活態度得到了更多的瞭解，使我對他的敬佩，更加深了一層。

在蘇州這一個時期，因爲局限於看守所裏，行動受到了限制，所以我所能知道韜奮的，多半是他個人生活方面的。那時他全部時間差不多都用在寫作方面，雖然和在獄外一樣也定有作息時間，但他工作的時間，自早至晚幾乎全部是握着筆埋着頭在著譯，其聚精會神，集中思慮的情形，任何外面的吵擾，對他都不可能發生影響。即使我們在打球的時候，他也能在球場旁邊一只特製的寫作籐椅上運

筆如飛的寫作他要寫的東西。在看守所裏來探問我們的親友，可說絡繹不絕，但是，他爲了寫作的緣故，寧可簡慢了遠道而來的朋友，而不肯放棄他規定好了的著述工作。其認眞工作，一絲不苟的精神，現在想起來，眞値得學習。每天我們可以看見他鋪紙伸筆，案上堆着材料，搖動着筆桿只往着紙上移動。在獄裏雖僅八個月，確有十年如一日的樣子。就我所能記憶的，他在獄裏所寫的有『經歷』、『萍踪憶語』、『讀書偶譯』、『展望』四種，足足有數十萬言之多。其專心致志，忠誠於自己的工作，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他對於寫作的態度是如此嚴正積極，其實他對於休息娛樂，也有同樣的態度。當他休息的時候，他也盡量休息。譬如大家運動和打球的時候，他也同樣的聚精會神專心一致的打球運動。有的時候他會模仿卓別林的行路，盡情歡樂。所謂工作時候工作，娛樂時候娛樂，他是充分實踐了的。

我們讀他的文章，知道他對於黑暗勢力的嫌惡和抨擊，是非常明顯而且『很不客氣』。所以遭受他們的嫉恨，也最深。但他的這種精神，到他最後的呼吸，也不會有所改變。對於他們的嫉恨和暗算，一無顧忌。他畢生和這種勢力在搏鬥，從未鬆懈。記得在蘇州，偵查我們的檢察官戴了有色眼鏡一定要韜奮承認『人民陣線』，韜奮反抗他的壓迫，從理論上事實上予以反駁。開始由爭論而奚落，終於當面衝突，繼後幾幾乎引起其他糾紛，他卻視若無事。誰都知道，檢察官在偵查『犯罪』的時

候，掌握絕大的權力。韜奮兄在這看守所裏是一個『待決之囚』，而他不顧一切，不屬強暴，依然爲着是非，爲着眞理而不惜與他抗爭。其膽識的超人，不妥協不屈服的精神，是不得不令人欽佩的！

當檢察官偵查完畢，認爲有罪而起訴之後，高等法院開庭審理的時候，韜奮兄陳述救國會主張，以及答復檢察官的起訴意旨，他竟如演說一樣，態度特別激昂，而且聲色俱厲的斥責黑暗勢力對於純潔的愛國行動的誣衊，至於聲嘶力竭，使全法庭的法官律師以及旁聽者，愕然相顧。他也不以爲意，而且認爲打了一次勝仗！

——沙千里

•

我認識韜奮先生並不算久。民國二十八年三月，我從華北敵後來重慶，先生約我到生活書店總管理處談話，很用心地，聽我給他敍述華北敵後的實際情況。我的話，有時說得不夠詳盡，不夠明瞭或者他所不易了解，他一定要追根究底地問，決不客氣，決不含糊，但態度却是非常謙遜的。另一方面，每聽到那裏人民大衆英勇鬥爭的事實，便立刻興奮起來，鼓舞起來，而對於敵僞的殘暴和反動勢力的卑劣，則表示切齒痛恨。我發現他是一個具有深刻的理知和豐富的感情的人，是一個追求眞理和

擁護眞理的人。

在這次談話之後，我被約做了先生所主編的『全民抗戰』的經常寫稿人，同時，也就成了先生的朋友。說是朋友，但平時却很少往返。記得我在重慶將近二年的時期內，只到過先生家裏一二次。這是因爲我不慣找朋友擺龍門陣，而先生呢，整天忙於工作，也無暇和朋友擺龍門陣。我們的晤面，常是在當時頻頻舉行的大小集會中。在這些集會中，我更發現先生的許多優點。首先，他堅持着正確的政治立場，決不動搖，決不放棄。其次，他具有着誠懇坦白的態度：在討論問題時，爲了獲得正確的結論，對任何人都不憚激烈爭辯，以至面紅耳赤，決不無原則妥協；但如果發現自己的主張錯誤，則不惜立刻接受別人的意見。第三，他抱着堅強的自信心，但却不驕矜自滿，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決不冒充內行，輕易發言，而是尊重專家的意見。最後，他生活有規律，辦事負責任。例如開會，只要是事先約定，便很少缺席或遲到；對於自己認爲不必要或不可能出席的會，事先，便拒絕參加。同樣，他所答應做的事，一定要做到，如果不可能做到，事先，便不輕易答應。這些優點大都是我們所缺乏，而常引以自勉的。

先生到香港後，依然和在國內一樣，致力文化運動、致力民主運動、致力抗日救國運動。他被人們認爲救國會在海外的領袖。但是他自己始終不以領袖自居，他常對我說：『我的能力和志趣，都不

允許我做一個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我不過是一個喇叭手，吹出人民大衆的要求罷了』。他雖然十分忙碌，忙到像他自己所說，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像一個殭屍一樣，但仍絲毫不改變他那認眞、負責任、實事求是的治事精神。記得有一次，他爲了要答覆『大衆生活』一個讀者所提出關於蘇聯選舉法的問題，不憚從九龍渡海到香港（這時，他住在九龍，我搬到香港），和我來商量。這種精神實在值得敬佩，値得做我們的模範。

——張友漁

*

我們可以說，在中國最近三十年史中，文化前驅者對於中國青年學生的影響，除了魯迅先生之外，是沒有人可與韜奮相匹敵的，韜奮終身是爲民主主義而奮鬥的戰士，也可以說是爲民主運動而犧牲的。沈衡山先生說：『韜奮的死，是死於沒有民主政治』，這是十分痛心的話。現在就不說韜奮的思想及其一切，我祇說從他對於處事處世的認眞態度，這的確是値得做我們模範的。

民國三十年春，許多朋友都去香港，那時韜奮主編了一個刊物叫做『大衆生活』，這是以前『生活』、『永生』一脈相承的刊物，韜奮對於這個刊物編輯的負責與認眞實在是可敬佩的•這是一個週

刊，由韜奮自任主編，編輯委員六人，金仲華、茅盾、喬木、夏衍、胡繩和我。我們每禮拜六必在太子行二樓開一個編輯會議，討論下一期應該寫的題目並分配寫文章的人。韜奮是執筆最勤的人，週末筆談自然每期有他，而且大衆信箱每期他總要回答許多讀者的問題（字數常達數千），他對編輯與選稿的認眞，以及他對讀者來信的不憚煩精神，眞使我自愧勿如。由我與他共事的幾個月中，我深知『生活』以至『大衆生活』之得到廣大讀者的愛護與同情，決不是僥倖或偶然的。

又有一次我們同坐巴士（即公共汽車），普通一坐上去，就要購票，但車中有時乘客太多，售票員不及一一售票，而乘客目的地已達，往往就往下跳，揚長而走，這是決沒有人來阻止你的。我們那天三四個人，由韜奮拿出錢買票（每張港幣五仙），那天大概因爲人多，我們坐到了目的地，而售票員還沒有過來，照例這時往下一跳，也就算了。但韜奮先生却一定要把票購過以後方跳下車來。這是一種不欺暗室的態度。如果我們中國人大家都有這樣的態度，則揩油與舞弊的作爲，簡直是我們所不能想像的了。

韜奮先生値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就拿以上一二件事來爲例，即可看出。觀人都必以其微，由這種瑣細生活中，也可知道韜奮平時的處事與處世了。

——千家駒

他熱情虛心大公無私

我不能不回憶到您未離開重慶以前，您住的衡舍和良莊只隔一個坡陀。隔三天兩天彼此一定要見一面，有了問題固然要往找，坐悶了也要往找。尤其是您的常常鼓勵着我做白話文字多看書，提高我對於研究的情緒，並且常常勸我要多休養。韜奮！您簡直是我的精神的啓發者，是我的精神的保護者。您譯外文最快，一邊看一邊寫，像在那裏抄自己做好的文章一樣。您譯『蘇聯的民主』和『從美國看到世界』兩書的時候，我常常坐在您桌旁。我說，韜奮，不要妨礙了您，您總說，不要緊，不要緊，一面就很起勁的講解給我聽，一面仍是筆不停揮的寫。我則呷一口您夫人替我泡的熱茶，聽一句您講的『不可不知道』的書的要點和內容。且呷且聽，且聽且呷，那時我的愉快我的安慰，現在追想起來眞有非筆墨所能罄吐。我從這種地方得到您給我的益處實在太多。而現在呢？

敵機濫炸不斷的幾個年頭，我們沒有一個時候不是同在一起。總是和您全家同在一起的，一同提包挈孩到防空洞去，一同走路回家。您呢，總是手裏拿着一本書，不斷的看，可以寫就在寫，因爲您

的主要工作是在關心所編的刊物，不要叫它脫期。這種精神我看在眼裏，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在參政會裏，您對於自己的提案是萬分的謹慎和忠實，對於朋友的提案，您如認爲重要亦必盡全力來幫助。我記得，有一次我提了一個『外交應以美蘇爲中心』的提案，內容寫得並不完盡。您在小組審査會裏面一個個去疏通，一個個去接洽，憑您的妙舌碰釘子也不管。最後拉我到審查會去作說明，那時討論形勢頗見緊張，結果付表決只差一個人不舉手，沒有通過。我對於您這次的協同奮鬥，非常感動，也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

韜奮，我不能不更回憶到一件事。您是最天眞，最能活潑潑地表現您的誠摯而坦白的情感，笑起來嘻嘻嘻，像個小孩子。這聲音還在我耳邊。我記得有一次在蘇州早晨我在洗臉，不曉得怎樣流下點眼淚。您趕緊問：爲什麼爲什麼？我說：『我恐怕看不見中國的太平進步的日子了。』您這時像大人慰撫孩子似的走近來拍着我說：『不會的，一定看得見！』誰知今天您反先我而死，連世界的勝利都等不及看呢！我眞是要痛哭一場，以洩我心頭的義憤和深悲。

您在蘇州拘押中寫成您『經歷』的一書中間，有兩段話我很記得清楚，我要拿來寫在這裏，一段說：『我的立場是中國大衆的立場，我的主張是自信必能有益於中國大衆的主張。我心目中沒有任何黨派，這並不是輕視任何黨派，只是何黨何派不是我所注意的，只須所行的政策在事實上果能不違背

中國大衆的需求和公意，我都肯擁護，否則我都反對，我自己向來沒有加入任何黨派。』一段說：

『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個新聞記者，在今日要做的還是個新聞記者，不過要在新聞記者這個名詞上面加上永遠立於大衆立場的一個形容詞。我所僅有的一點微薄的能力，只是拿着這枝禿筆和黑暗勢力作堅苦的抗鬥，爲民族和大衆的光明前途盡一部份的推動工作。我要肩着這枝禿筆揮洒我的熱血，傾獻我的精誠，追隨爲民族解放和大衆自由而衝鋒陷陣的戰士們，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沈鈞儒

*

韜奮先生大公無私的精神是令人感動的。大家都知道，生活書店是他主持的。這個書店有了遍於全國的規模，也是大家看見的。這個書店不但有了巨大的影響，而且也有相當的資財，也不會有人否認的。然而當韜奮先生於皖南事變後爲抗議大後方的逆流，憤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潛往南洋進行民主運動的時候，一般人不會想像他個人最低物質生活會發生問題。距知我們在香港，竟發現他生活上毫無準備，他也沒有個人積蓄，眼看他和他家庭最低用度無法維持，他又不願受人無原無故的幫助，乃由他經常寫稿的華商報館每月預借稿費四百港元給他，才解決了他的生活。其實該店在港本存一筆

經費，韜奮先生本可動用，但他則認爲書店經費係全體社員與讀者共同辛苦經營而來，並應完全用在書店事業上，他暫時挪用也是不願意的。

他又是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善於和樂於團結共同戰線上的同志的。我認得他是在一九三七年春，有一次胡愈之約我和他在上海杜重遠先生家中商量辦一個大報的事情，韜奮先生親熱的握着我的手說：『你一定來一個。』他並不以爲我是當時文化界的新兵而看不起我。踰年在武漢，他曾和沈鈞儒先生代表全國救國會到南昌轉南潯路前線慰勞抗戰將士，我看到他沿路無論遇到汽車司機、學生、服務團員、傷病兵、小店員以及上級軍官和戰士，他總是熱忱地問，專心地聽，覺得有問題時，則埋頭去記；聽到前線的好消息，則眉飛色舞；聽到壞現象，則低頭太息，好像他自己受了創傷。

他是名滿天下的，他是愛惜他的名譽的，然而爲了大衆的利益，他又是毫不考慮使用他的名字的。在工作中他又是最安於本身工作崗位，毫不個人英雄主義的。在實際鬥爭中，無論在上海、在武漢、在重慶、在香港，同他一起共同工作的朋友，都看到他一個非常可寶貴的特點，即在商議問題時，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不輕於與人無原則的調和。但到分配具體工作任務時，他却一點沒有風頭主義與個人權利思想，他總是說：『宣傳工作算我的。』他自己知道他是長於文字宣傳工作，而不善於其他部門工作，其他工作必須讓其他更適當的人去作。

三五年冬，『生活週刊』復活爲『大衆生活』。不久之後，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我們很快就看到這刊物以最大篇幅來反映這個運動。一連好幾期的封面照片是學生運動的羣衆場面，主要內容是報導與響應這一運動的文章。我們從這裏得到很大的鼓勵。它成了上海文化界與北平學生運動的重要橋樑，成了全國救亡高潮中的權威刊物。它的銷路打破了歷來刊物的紀錄。當時『大衆生活』每期出版之後，先寄幾千份到北平學聯，由學聯交各校和市場上發售，除了寄回成本的一小部份錢之外，大部就做爲學聯的經費。

『九一八』後，我一直是『生活』、『大衆生活』的讀者。吸引我的是那上面報導全國各地方生活情況，反映各種人思想動態的文章。開始與韜奮先生通信，是我參加一個宣傳團在湖北鄉下走着的時候，告訴說這裏缺乏讀物之後，就按期接到四份『抗戰三日刊』由我們轉贈給各地的知識青年們。第一次看到先生，是三八年春天在武漢。因爲要請人給宣傳團做些報告，到金城文具店樓上會見了他。他介紹金仲華先生去給我們講戰局。那天還有一位健壯的中年紳士在座，韜奮先生說：『給你介紹一

位朋友，這位是杜重遠先生。』從他的親切接待中，我感到他是願意和青年做朋友，給青年人做朋友的。當時談到了有些青年想到新疆去，他說：『不應該很多人去到那裏，那裏離抗戰的中心地方太遠了。』

三八年秋天，我要去桂林，行前去請教於他。他給我講了廣西的一般情況，因爲他由上海到武漢是取道廣西遊歷過一次的。他給我預支了一些稿費做旅費，寫了兩封介紹信，一封交生活書店桂林分店的經理，讓他給我生活上一些方便，一封交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楊衛玉先生，請他給我介紹職業。我在桂林就住在生活書店堆棧的樓上，在中華職教社補習學校裏擔任一點功課。

我與韜奮先生接觸不多，但由這一點微末經過，也可看到先生對一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所持的態度，以及所給予的幫助。

——魏東明

他勇於追求進步

從第一次大革命前後起，韜奮先生就開始了寫作的生活，差不多二十年的期間，他幾乎是每天不停筆地工作。這是中國政治上多變的期間，是中國民族災難深重到極頂的期間，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在掙扎，在反抗，在鬥爭，在聯合的期間。這裏有國民黨專制的建立，有剿共和軍閥內戰，有九一八事變，有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和救國會活動，有中國共產黨的團結抗日的號召，……在這中間，韜奮先生的工作，是與人民的鬥爭不能分開的。他抓着了人民政治上生活上所遇到的一切大小問題，給與了適當的回答，他的影響之所以能很快地擴大起來，就因爲他的文章，最能反映鬥爭中的中國廣大人民的要求和情緒。

他常說自己的立場是『中國大衆的立場』，他是名符其實地站在大衆的立場上工作的。他自稱爲『新聞記者』，同時他也的的確確盡了公正的新聞記者的職務，把自己的文章，嚴格地用作民衆的喉舌。在中國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這不但要有爲羣衆服務的滿腔熱誠，要有不屈不撓主持正義的堅定

節操，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實事求是，丟棄自己的主觀，而善於了解羣衆的切身要求，體察人民的思想情緒，爲羣衆說出他們心裏眞正要說的話。要這樣爲民衆代言，是一件極吃重的工作，必須出以很大的努力，用全副心力來對付，隨隨便便大筆一揮，就要被稱爲人民的作者，是靠不住的。

在他的自傳性的『經歷』一書裏，講到怎樣編輯『生活週刊』時，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苦心嘔血的情形：『每期的小言論，雖僅僅數百字，却是我每週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我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爲最該說幾句話的事情，發表我的意見，這一欄也最受讀者注意，後來有許多讀者來信說，他們每逢社會上發生了一個轟動的事件或問題，就期待着這一欄的文字。其次是信箱裏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會神的工作。』

『聚精會神』，研究怎樣說出讀者羣衆所要說的話，解答讀者所提出的問題，這是他工作力量的泉源。必須有這種非常集中的努力，才有可能使他密切地和『大衆』站在一起，成爲一個最好的新聞記者（雖然新聞記者只是他的職業之一部分），使他能正確地替人民說話，而爲人民所愛護，使我們能夠在他身上，看見新聞記者的職業的光輝——這一個職業，在一些爲法西斯主義及專制主義歌功頌德的新聞界敗類身上，是被褻污了。

知識份子走向大衆，是有一定過程的，他必須首先清算了自己思想中的各種個人主義的因素，然

後用集體的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韜奮先生也不是天生的大衆思想家，他並不是有什麼超人的特點，他的最大的長處，不過是虛心學習，勇於批判和放棄一切不適合羣衆需要的思想，熱烈地追求和接受對人民有利的新事物和新思想。他的學習，主要是在羣衆中，在工作中，他沒有個人的虛僞自尊心以及各種主持成見的包袱，只有爲羣衆服務的高度責任心，和不斷追求有益於人民的新知識的熱烈慾望。『我個人是且做且學，且學且做，做到這裏，學到這裏。』就是這一種責任心和學習的精神，使他的思想能夠經常進步，能夠不斷地愈更密切地和大衆靠攏起來。在早年參加職業教育社工作的時候，他就已經善於在羣衆生活的實際情況中學習，並根據實際觀察所得，來校正自己的思想：

⊗『在各處接洽若干中學舉行職業指導週運動，我所感到興趣的是乘着這個機會和各地青年談話，並到各處觀察觀察社會的情形……可是說來也許有些奇怪，我愈研究職業指導，愈在實際方面幫着職業指導吶喊，愈使我深刻感覺到在現狀下職業指導的效用有限，愈更使我想逃出職業指導的工作……說句笑話，我在這裏參加了職業指導運動，對於青年究竟有什麼實際的效果，我實在不敢說，可是對於我自己確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這現實的教訓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轉變。』（經歷）

職業指導爲什麼沒有效果呢？他的思想是怎樣的『轉變』了呢？他後來解釋得明白：

『現在不是由個人主義做出發點的所謂獨善於身的時代了，要注意怎樣做大集團中的一個前進的

英勇的鬥士，在集團中能獲得個人的解放。關於這一點，有一點雖然細微而却顯明的事實可以做例子。從前實施所謂職業指導的人們，總是把應該怎樣努力吃苦的話勸導青年，這對於當時有業可就而不肯努力不肯吃苦的青年說，當然不能算錯，但近來有不少很努力很吃苦的青年，因爲次殖民地的經濟破產，不是因他們自己個人過失而遭着失業的痛苦，指導者再對他們發揮「拚命努力拚命吃苦」的高論，便是犯着牛頭不對馬嘴的毛病了。』（大衆集）

能夠向羣衆學習，能夠接近『現實的教訓』。能夠依據現實的教訓來『轉變』自己的思想，就能夠在思想上有開展、有進步，不至於鑽進牛角尖，越鑽越出不來，就會在工作上有創造、有改進，不至於停滯不動、因循敷衍、沒有生氣。韜奮先生的思想和工作，就由於有以上的優點，而能夠表現出不斷精進，不斷創造的精神，而這些創造改進，歸根結底，仍然以羣衆的需要、羣衆的利益爲依歸，適合於羣衆需要和利益的東西，就被採取，否則就要被突破、被打碎。就由於這些原因，他能夠使他所編的『生活週刊』迅速進步，由職業指導的刊物，進而成爲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從偏重個人生活修養的內容，轉變爲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讀物，由討論一般社會政治問題的刊物，變爲事實上爲救國運動的宣傳和組織中心。每進一步，就愈更深入地與中國人民大衆的生活和鬥爭相結合，並獲得了愈更廣泛的羣衆的擁護。

『聚精會神』爲服務人民而工作，從『現實的教訓』中虛心學習，從羣衆的實際要求出發，來創造工作、改進工作，這就是韜奮先生的思想和工作的力量的泉源，這就是韜奮先生自己所謂的『中國大衆的立場』。他的大衆立場，不是空洞的，而是有這具體內容的，不只是說說的，而是有他的行動作證明的。

——艾思奇

＊

在接辦『生活週刊』後，因與廣大讀者發生聯系，先生給廣大讀者做了老師：給他們解決問題，代他們服務；但廣大讀者也給先生做了老師：他們在無數萬封的通信中，使先生了解了各種具體問題，了解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黑暗面。因此，在這一時期，先生的思想也有了巨大的進步，即逐漸自覺地跳出狹隘的個人主義的圈子而站到人民大衆方面來。這可由『生活週刊』前後內容的不同上看出來。在先生接辦該刊的初期，其內容只偏重於個人的修養問題，並注意於職業修養的商討，這還不出於教育和職業指導的範圍。但隨着先生『個人思想的進展而進展』，該刊也就『漸漸變爲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具有『研究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衝鋒性』了。先生自己在『經歷』中說道：『也許是由

於我的個性的傾向和一般讀者的要求，「生活週刊」漸漸轉變爲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對於黑暗勢力不免要迎面痛擊』……『不但如此，「生活週刊」既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發生着密切的聯系，社會的改造到了現階段又決不能從個人主義做出發點；如和整個社會的改造脫離關係而斤斤較量個人的問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於是「生活週刊」應着時代的要求，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自一九二九年後，該刊每期關於揭發國民黨黑暗統治、禍國殃民、貪贓枉法一類文字的增多，就是證明。此後，該刊經職教社的允許，也脫離該社而獨立起來，由該刊同人組織合作社來經營，因之，該刊得以順利地向前發展。關於這一點，先生一再稱讚職教社諸位先生態度的光明。

『生活週刊』突飛猛進之後，使『時時立在時代的前線』。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和嚴重，先生也成爲爲民族解放而積極戰鬥的戰士。

其後先生對國民黨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欺騙政策，以及淞滬協定、塘沽協定這些賣國條約，都盡力加以抨擊。此時國民黨統治者對生活週刊已不斷加以壓迫——停止郵寄或扣留。

在經過『九一八』如『一二八』這些現實的教訓以後，先生思想上的方向也更加明確了，對於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認識也更加淸楚了。其時先生自謂：『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後的比較，自覺思想上的

方向日趨堅定，讀者於前後各文中或亦可看出一二』；在給讀者的一封覆信中，先生說：『爲個人利害而研究學問，檢討問題，是充滿了自私自利的意味，而且也得不到出路，無疑的是要沒落的；爲大衆福利而研究學問，檢討問題，乃至談一段話，作一篇文，以及其他種種活動，都以此爲鵠的，方向既有所專注，心神自有所集中，隨時隨地都可會有推進新時代車輪的可能性。』先生當時抗日的主張，也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觀點，先生自己說道：『自九一八、尤其是一二八以後的拙作，對抗日救國的文字特多，這是認爲民族自救乃目前的要圖，決無意於提倡狹隘的國家主義。作者相信在現階段內的我國革命，須考量中國的特殊情形，應暫以中國民族爲本位；但相信革命的最後目標，是世界各民族平等自由的結合，而決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張仲實

他是澈底的民主主義者

我對鄒韜奮先生的傾慕，不僅在其少年時代的刻苦成學，不僅在其壯年時代挺身入獄，作了舉國抗戰的嚮導，不僅在其以犀利文筆，豎旗文壇，橫掃千軍，刺透反動派的肺肝，盡了大衆喉舌的光榮職務；而尤在其能以一個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份子的代表而堅决走上爲工農兵大衆服務的道路，這是韜奮先生永垂不朽，可爲式範的地方。我們熟知韜奮先生的歷史，他是以一個民主主義者走入戰場，偉大的革命實踐推動他向前邁步，直至與共產主義相結合，最後以他的爲國家爲民族爲人民服務的品質和事業說，證諸共產主義者前列，可說毫無愧色。因此鄒先生的道路是澈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最終結合的道路。澈底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與共產主義的一致性在鄒先生一生歷史實踐中，又一次證明了。比如孫中山先生是前三十年的一個最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其一生實踐，晚年達到很正確的承認共產主義是革命民主主義的朋友。比孫中山先生稍後約當十年至十五年左右的魯迅先生，也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的啓蒙大師，他幾乎完全走着相同路線，其晚年不但與共產主義相結合，且成爲

獻身前列的最堅强的舵手和戰士。這是第二個例子。繼孫、廖兩公之後的韜奮先生，從革命民主主義開始，直達到共產主義行列，那麼，我們想一想這是一件偶然巧合吧？我想不是的，我想這裏極其莊嚴鄭重地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總規律，這一條定理有不可抵抗的偉大力量。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啓蒙大師們，均遵循這一條路作了開路先鋒，反動派的任何手法都是無法逆阻的！因此凡是一個眞正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絕難半途而廢，他至少會承認中國共產主義者是他最好的朋友。反之，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如果拒絕參加民主革命，或不獻身民主革命前列，或於獻身之後陷於同化，不能澈底推行民主革命，忘記了本身的任務，那必然是假的共產主義者，亦必失敗無疑。我想這種例子也很多的。因此，我肯定的說韜奮先生一生的奮鬥，其偉大成功便是繼孫廖兩公之後，再度指出中國革命的總規律。這種價值是無可比擬的，也是我所最傾慕的地方。

——陳毅

●

韜奮先生是愛國者。從他的文章、他所經營的出版事業、以及他一切奮鬥的歷史，可以了解到他對祖國具有無限的熱愛。他希望祖國的獨立和强盛。由於這個希望，使得他不休止的追求救中國的道

路。他看到了各種的生活，經過了各種的思索，他知道了：如果沒有人民大衆覺醒的行動，沒有實行廣大的民主，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大衆與民主相結合，中國決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決不能使中國獨立强盛起來。而現實的鬥爭，更使得韜奮先生認爲：要使中國解放，必須信賴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進行的事業。韜奮先生首先是以樸素的愛國者接近中國共產黨，成爲中國共產黨最好的朋友，隨着鬥爭和思想的發展，又一步一步的使得他自願地成爲一個中國共產主義者。他的遺囑，表示他願意在死後列名爲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熱愛，正是從他對祖國的熱愛發展來的。這個受有充分的近代文化教養的中國典型知識份子，正如他的歷史所指示的，他自己所走的路是很曲折的；但他對於中國的出路，連他自己的出路，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這方面找到了，而且願意爲中國共產黨這方面的眞理而生，爲中國共產黨這方面的眞理而死。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苦難中的中國一般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大衆、有人類正義感的知識份子所必然要走的路。過去是這樣，現是也是這樣，將來的事實將更是這樣。韜奮先生在這中間算是一個最好的榜樣了。

人民公敵——法西斯匪徒們對韜奮先生的仇恨，是跟着韜奮先生思想的發展和他爲祖國事業而奮鬥的日益加强，而增加的。韜奮先生進一步，而人民公敵對他的仇恨也進一步。在重慶，韜奮先生是特務獵狗們追逐的一個重要目標，逼得韜奮先生顚沛流離。韜奮先生終於在這個顚沛流離中，犧牲了

自己的生命。人民公敵——法西斯匪徒們聽到了韜奮先生的死訊，當然是要高興的；但是，法西斯匪徒們不過是一堆行屍走肉，一堆人類最惡臭的垃圾，他們很快地都要被世界的人民大衆從地球面上掃淸出去了。人民大衆是永遠不死的；韜奮先生是中國人民大衆的朋友和戰士，因此，韜奮先生是永生了。

——陳伯達

他的死號召我們繼起奮鬥

韜奮先生哀詞

·在重慶追悼會上演講稿·

韜奮先生：你是我們中國人民的一位好兒子，我們中國青年的一位好兄長，中國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師。你的一生，爲了人民的解放，爲了青年的領導，爲了文化的建設，尤其在抗日戰爭發動以來，爲了爭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你是很慷慨地、很熱誠地用盡了你最後的一球血。在目前我們大家最需要你的時候，而你離開了我們，這在我們是一個多麼大的損失呀！這是一個無可補救的損失呀！（泣聲和掌聲）

韜奮先生：在你自己，怕應該是沒有什麼遺憾的吧。你把你自己慷慨地奉獻了給人民，而你自己已經成爲了一個很莊嚴的完整的藝術品，在你自己怕應該是沒有什麼遺憾的吧！（鼓掌）要說有什麼

遺憾，那一定是在目前反法西斯戰爭已經接近勝利的期間，而你沒有可能親眼看見中國人民的得到解放，中國青年的無拘束的成長，反而在彌留的時候，你所接觸的是中原失利的消息，湖南失利的消息！（大鼓掌）這怕是使你含着滾熱的眼淚，一直把眼睛閉不下的吧！這在我們，作爲你的朋友的我們，尤其是長遠的一個哀痛！是我們的努力不夠，沒有把勝利早一天爭取得來，反而在全世界四處都是勝利的聲浪中，而我們有日蹙國萬里的形勢，增加了你臨死時的哀痛！我們在今天在這兒追悼着你，至少我自己是深深地感覺着犯了很大的罪過的！但是韜奮先生：你是眞的離開了我們嗎？你是眞的放下了武器倒下去了嗎？沒有的，永遠沒有的。你並沒有離開我們，你還活着。你還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每一個青年的心裏，千千萬萬人民大衆的心裏。你是活着的，永遠活着的，從中國的歷史上，從我們人民的心目中，誰能把鄒韜奮的存在毀滅掉呢？（鼓掌）你的武器，你的最犀利的武器也交代在我們手裏來了。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差不多都有你的武器，這就是這麼一枝筆！你仗靠着這枝筆，爲人民的解放，爲反法西斯的勝利戰鬥了來，我們也應該仗着這枝筆，爲人民的解放，爲反法西斯的勝利戰鬥起去。（大鼓掌）這是一枝不折不扣的名實相符的鋼筆，有了這枝筆存在的地方，便是民主存在的地方，沒有這枝筆的地方，便是法西斯存在的地方（鼓掌）。像德國日本那樣法西斯國家，它們的筆是沒有了，是變了質，變成了刷把。（鼓掌）替統治者刷漿糊，（鼓掌）刷粉牆，（鼓掌）

刷斷頭台，（鼓掌）刷槍筒，（鼓掌）甚至刷馬桶。（鼓掌）這樣的刷把，遲早是要和着法西斯一道，拿來拋進毛坑裏去的。（鼓掌不息）

我們中國幸而還有這一枝筆，這是你韜奮先生替我們保持了下來，我們應該要永遠的保持下去。在目前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的時候，筆桿的使用是要愈見代替槍桿的地位了。槍桿只能消滅法西斯的武力，要筆桿才能消滅法西斯的生命力。鄒韜奮先生，你的一生用你的血來做了這枝筆的墨，我們要繼續不斷地把我們的血來灌進去。鄒韜奮先生，你的一生把你的腦細胞來做了這枝筆的筆尖，我們要繼續不斷地把我們的腦袋子安上去。（鼓掌）我們要紀念你，韜奮先生，我們就要永遠地保衛這枝筆桿，我們不讓法西斯再有抬頭的一天，不讓人類的文化再有倒流的一天。這也怕就是，你通過你的筆所遺留給我們的遺囑。（鼓掌歷久不息）

懷念鄒韜奮先生

——郭沫若

永別了，

英勇的戰士，
敬愛的朋友。
你去得太早一點，
中國還沒有自由。

您生平是
「主張堅決；
態度和平」；
律己治事主認眞；
研究學術貴虛心！

您所寫，是
渾灑熱血，
傾獻精誠；
爲民族解放而戰，
非解放大衆不成。

您的筆，是
自由之火把；
火把迎民主，
不惜犧牲自我，
照着衆人爭取。
您的死
朋友們傷心，
敵人們歡喜。
如果火種不全熄，
傷心歡喜都不必。
您看啊！
自由之火把，
以火再點火；
愛好自由千萬心，

赤心顆顆都着火。

您看啊！

火把千千萬，

逆風放火海，

掀起火浪千萬丈，

浪到無人能阻礙。

您看啊！

火把千千萬，

一熄千萬亮，

照着中華大民族，

民主團結打勝仗。

您看啊！

火把千千萬，

一熄千萬亮，

兇婪納粹法西斯，
東方西方快滅亡。
您看啊！
火把千千萬，
一燒千萬亮，
鑄成民主新中國，
自由幸福應無量。
安息吧！
英勇的戰士，
敬愛的朋友：
死而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者久。

——陶行知

祭鄒韜奮先生文

敬愛的韜奮先生：

這是您逝世的二週年祭。

您的朋友親戚，

在這裏舉行一個家庭的儀式，

來把您的遺體，

葬入祖國的大地。

飃零遠在天涯海角，

呼吸的是自由空氣；

他們長得那麼健壯，

您心裏應該歡喜。

您記得一年前的今日，
人山人海在陪都的祭禮，
證明您並沒有死，
是活在每位民主戰士的心裏。
凡是得到了您的精神的人，
都虎虎的成了萬人敵；
那是的的確確的事實，
當時的吼聲震動了天地。

不久日寇終於投降，
我們懊悔您沒的親眼看見勝利。
那裏知道天下爲私，
勝利不屬於人民自己。

沒有親眼看見也罷，
看見了反而要大大的生氣。

於今是內戰展開，
工廠倒閉，
農村破產，
災荒遍地，
戰士得不到休息，
老百姓得不到飯吃。
買辦階級，
快把大好山河變為殖民地。，
陷害黃帝的子孫，
淪為萬劫不復的奴隸。

而且一黨專制，
變本加厲。
不敬婦女不尊老，
中外古今太無禮。
有軍隊，有憲兵，有警察，
還要運用暗殺除異己。
貽大中華以奇羞，
爲文明國所不齒。
公樸，一多，
前仆，後繼。
是誰刺殺了馬梯窩蒂？
令人聯想到悲慘的意大利。
中華民國之光榮，
是你們的捨身取義。

還，給了我們光，給了我們熱，給了我們力。
讓我們鍛鍊自己，
「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永遠踏着你們的脚跡。

和平最急！
民主第一！
要做到安居樂業，人民萬歲，
追思才算完畢。
還有，我們要把您手創的書店，造成文化倉庫，
供給整個民族的精神食糧，
使大衆養成樂學來求眞的嗜好，

眞正變成五强之一。

敬愛的朋友啊！願您安息。

偉大的戰士啊！願您安息。

——陶行知

卅五、七、廿二。

永在追念中的韜奮先生

每册收回成本國幣伍仟圓

編印　韜奮出版社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總經售　生活書店
重慶・香港・星加坡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

(61) S. 0001—3000

册数	售价
	.30